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9月15日第24期 总第234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34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二十四）

目录

【专稿】

夏剑勇 高云鹏 亲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附：大字报原文）

向南雷 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分析、论证方法与文风

姜学斋 关于第一张大字报的两种观点

——“策划指使说”与“推动支持说”浅析

【评论】

宫香政 论“政治倾向性”

【述往】

蒋世信 我与北师大——开学后的“专业思想教育”（一）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胡锡奎之死（十五）

【文摘】

金宏达 “时汉人事件”始末

颜品忠 文革记忆——一个北京大学普通教师的动乱经历（第一、二章）

【资料】

时汉人 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人民日报》1966.2.10）

郭罗基 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1967.3.3）

【读者来信】

1. 邵新英：为邹行的封面设计点赞 2. 林晓：介绍一幅旧画

【本刊声明】

【专稿】

亲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

夏剑勇 高云鹏

1966年5月25日下午1时，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了一张《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作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赵正义、宋一秀、杨克明、夏剑勇、高云鹏和李醒尘七人。七名作者中，聂时为系党总支书记，赵为总支副书记，宋、夏、高、李均为哲学系青年教师，杨克明本来也是哲学系教师，但国际饭店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就调往中国科学院电工所了。

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自发的支持和有组织的反对，针锋相对，斗争非常激烈，形势相当严峻。6月1日毛泽东做出决定，要求“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这张大字报，特别是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北大这张大字报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使大字报影响到了全国，起到了在全国发动群众性文化革命的作用。

这张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原因。它是北大，也是哲学系长期党内斗争，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长期党内斗争的延续和结果。李清崑在电子杂志《记忆》第225期上发表的《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对此做了详细分析。文章说：“我认为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北大内部由于各种政治运动所长期积累的多种矛盾不断叠加的产物，特别是北大社教运动之后长达七个月的‘国际饭店会议’整肃社教积极分子致使矛盾更加尖锐化的产物。这是大字报产生的第一位的原因即根本原因”，“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传达，是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决定性条件”。我们非常同意这个分析。在我们这篇回忆文章里就不再重复，以节省大量的篇幅，而仅就自己亲身经历，回忆这张大字报写作的过程。

酝酿和写作大字报是从5月22日开始的。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5月20日下午北大党委向党员干部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和副书记赵正义听取了传达。5月22日晚，聂元梓、赵正义、杨克明、宋一秀、夏剑彖、高云鹏在20楼杨克明家聚会，由赵正义根据记录传达了《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内容。赵正义一边传达，聂元梓一边做补充。在这之前批判三家村已经如火如荼，“五·一”节彭真没有露面，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听了赵、聂的传达之后，更加确认彭真和北京市委出了大问题，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把北大社教运动和国际饭店整风会议的案翻过来，并对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予以揭露和批驳。具体怎么办，采取什么方式？经过讨论，当时提出有几种做法：一是给报社写信，但我们的意见能否及时上报到党中央？没有把握；二是写小字报，贴在北大党委办公室的院子（即四院）里，但这样做大家不易看到，影响不大。最后我们一致认为还是写大字报好，可以把大字报贴到校园里，影响大。

这里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聚会是我们六个人？这六个人都是参加长达七个月之久的“国际饭店党员整风会”的北大社教运动积极分子。国际饭店会议说是“整风会”，但其目的就是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要把哲学系的社教运动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开除出党。他们的这一意图，在“整风会议”初期，暴露得尚不太明显，但随着会议的进展，特别是到中后期，这个意图就暴露无遗了。

我们有幸看到有关社教运动的一批原始材料。这批材料对于研究当年的那段历史弥足珍贵。据参加国际饭店会议的原北京市委干部李×在1967年3月的长篇揭发材料中披露：

（1965年）九月下旬，邓拓指使我说，要整理出聂元梓的单行材料，把过去工作中的表现，讲课中的问题，在经济系时的问题，整风社教运动中的表现统统收集起来，题目就叫《一个浸透了剥削意识的老干部聂元梓》。

九月廿八日，邓拓在市委大楼他的办公室秘密召集彭珮云、王庆淑、刘文兰和我等开黑会，亲自策划王庆淑的反攻倒算发言。……邓拓策划说：张恩慈是哲学系的害群之马，社会主义北大不要他，思想斗争也要刺刀见红，座谈会后放一天，再刺，再放再打，把张恩慈撂倒。

十一月十九日，邓拓来国际饭店找陆平、宋硕、彭珮云等策划下一段的倒算计划，邓拓突出地强调说：要把王庆淑的旗帜举起来。……叫王庆淑上第一炮，敌人这里开刀，就从这里顶，理直气壮。聂的材料要切实砸死，现在她靠上告打气，是回光返照，……我把邓拓要开座谈会的事告诉了宋硕，他同彭珮云等拟了一个名单，记得有陈××、……（引者注：下面九人名单略）。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市委大楼邓拓的办公室召开了这个黑会，陆平、宋硕、彭珮云、李康林、刘文兰等也参加了，会上主要是邓拓讲的，……他说：这次整风开始就宣布过有两种党性，聂、孙等现在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党性，抱成一团，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将来事实会证明，聂用的就是拉拢，威胁，打气许愿等手段拉成一个集团，现在看是与党完全对立的小集团。

参加国际饭店会议的市委大学部干部陈××，在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刘文兰（北大党委干部）屋里看到了图书馆学系史××写的一份反映哲学系社教积极分子议论校党委问题的打印材料，刘即指着这份材料说：“他们就是搞非组织活动，就是反党集团”。¹

根据会议印发的简报统计，专门召开揭批聂元梓的大会就达45次之多。会议领导小组的作为，引起了社教积极分子的不满与抵制，他们据理反抗，使得会议组织者的阴谋难于得逞。

直到1966年2月，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革命的烈火已经烧到北京市委，特别是直接烧到整风会议领导者头上。他们自顾不暇，只好草草结束会议，把他们想要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以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名义下放到北京郊区，化整为零，而且不许他们再

¹ 参见原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陈××1967年3月的揭发材料（此材料当时印15份）。

回到北大，也不许再回到市区。用陆平的话说，积极分子下放农村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是，聂元梓因病休养暂时未能下放；由于党务工作需要，总支副书记赵正义得留在系里看摊子；因教学工作需要，宋一秀和高云鹏必须留校授课；杨克明已经调到科学院电工所，暂时还住在北大的教师宿舍里；夏剑彘已经下放到昌平，正好家里有事请假回到北大。其他积极分子都已经下放，不在北大，所以当时就只有这六个人参加了聚会。

聚会上大家确定写大字报以后，又讨论了写什么内容，由谁来执笔的问题。大家认为，大字报的内容应该围绕着文化革命方向的问题。因为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让北大的学生去查阅大量历史资料，以证明海瑞是否平了冤狱。并以此为典型在北大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广，企图把文化革命引向学术讨论的方向，必须揭露他们的阴谋。关于执笔人，因为在此之前，宋一秀、赵正义曾应解放军报社之邀，写了一篇关于文化革命运动方向的文章，大家就推举宋一秀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起草大字报。

5月24日晚，仍是六个人在杨克明家里讨论宋一秀写的大字报稿。先是宋一秀把他写的大字报稿读了一遍。大家听后觉得大字报稿篇幅较长，重点不突出，不够尖锐有力。之后就如何修改大字报进行了议论，聂元梓、杨克明等都说了些具体意见，最后大家推举杨克明修改大字报。杨克明说要连夜修改出来，第二天一早去科学院电工所上班前把大字报稿交给高云鹏。

5月25日晨杨克明去电工所上班时，顺路把大字报稿给了住在24楼的高云鹏。高云鹏拿到稿子先叫同住24楼的宋一秀一同看稿子。这份稿子的内容吸收了宋一秀大字报的内容，和大家讨论的意见也是一致的。但大字报的结构和文字是杨克明重写的。宋一秀和高云鹏觉得这份稿子方向明确、重点突出、简明扼要、战斗力很强，写得很不错。之后他俩就分别通知赵正义、夏剑彘过来，在宋一秀的屋子里讨论杨克明的稿子。四个人一起对大字报稿做了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上没有改动。后来聂元梓来了，她看完稿子在最后加了一段话和三个口号。此后大家又一句一句审核，通过一句夏剑彘和高云鹏就各自抄写在大字报上，也就是同时抄写了两份大字报。之所以要抄写两份，是因为考虑给校党委提意见，

就要贴在党委院子里一份，另一份准备贴在大饭厅东墙上。

大字报抄完后，我们就陆续签上了名，第一批签的有赵正义、宋一秀、夏剑彥和高云鹏。第一个位子留给了聂元梓，她当时外出有事，回来之后就在第一位置上签了名。杨克明当时不在，为了能及时把大字报贴出去，高云鹏就在第四的位置替杨克明签上了名。因为大字报是杨克明修改完成的，把他的名字签上去是很自然的事情。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已调到科学院电工所工作，不是北大的人了，签上他的名字或许有些不妥。

大字报抄好并签了名之后，觉得签名的人少了点，但是好多人又都不在学校。后来想到李醒尘就住在24楼一楼，他平时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于是就由宋一秀去一楼找李醒尘，当时他正在午睡。把他叫上来，他看了一遍抄好的大字报，欣然同意，并在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大字报的作者最后就成了七个人。接着李醒尘便同赵、宋、夏、高一起去贴大字报了。

大字报贴在大饭厅外的东墙上，时间是中午1点钟左右。这时正是学生要去上课，工作人员要去上班的时候。大饭厅前是交通要道，贴大字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围观。后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影响很大，所以就用不着再往四院党委办公室院子里贴大字报了。贴的这份大字报是高云鹏抄写的那一份，夏剑彥抄写的那一份就没有贴出来。6月1日后，这份大字报不记得是哪个单位以留作档案为由要走了。据说这份大字报现存放在国家图书馆（即原北京图书馆），他们是从中央办公厅取过来的。

大字报贴出以后，很快就有了反响，支持大字报的比较多，其中很多是哲学系同学写的大字报。这和哲学系同学的政治敏感有关，也和大字报的作者在同学里的影响有关。但是，到五点钟左右，反对的大字报突然出现了，来势凶猛，还贴了些大标语，显然是有组织的行动。不仅出现了围攻大字报的情况，也出现了围攻大字报作者的情况，校园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高云鹏5点多钟到大饭厅去看大字报，被人认出是大字报的作者，不由分说就把他挟持到第二教室楼南边的一间平房教室里，展开了围攻。他们不让高云鹏说话，高一张口他们就喊口号，这显然是有组织的围攻，领头的是一个校团委的干部。赵正义得

知这一情况后，马上带领哲学系学生赶去支援。那位团委干部感到情况不妙，连忙下令撤退，随之一哄而散。

5月25日晚差不多12点的时候，华北局李雪峰书记（6月1日公布他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书记）来了，他在办公楼礼堂召开的全校党员大会上讲话，没有对大字报内容的对错表示态度。后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也到北大来了。张彦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贴大字报可以，但是不要贴在外边，要“内外有别”。此后贴大字报的地点就改到31楼后边的第三食堂。食堂里拉了很多绳子，大字报就挂在绳子上，很快食堂里就挂满了大字报。

当时我们觉得斗争不会很快结束，这个期间我们也不能沉默，于是就决定不断地贴出大字报，把斗争坚持下去。我们的第二张大字报，记得是在宋一秀原来大字报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大概是在6月1日也挂在了第三食堂里。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人就多了，原来同情我们的哲学系的教师们也都纷纷在这张大字报上签上了名。

6月1日晚饭前，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们，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消息，让我们注意收听。那时电视远没有普及，重要新闻都是通过晚上8点半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联播”发布的。那天全校的大喇叭都响了起来。原来是广播的这张大字报。我们听了广播心情无比激动，像是得到了解放。次日《人民日报》刊登这篇大字报时又发表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说“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评论员文章的旗帜这样鲜明，对北大党委、对陆平、彭珮云的定性这么上纲上线，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从这一天起，燕园沸腾起来了，我们从被打击的对象一下子变成了被人瞩目的人物，北京大学成了大家争先恐后要来的地方。外校的学生、机关的干部，工人、农民，乃至外地的也不远千里，络绎不绝地到学校来，表示对我们的支持。

当年，除聂元梓、赵正义之外，我们都是普通的年轻教师，对当时中央上层的斗争不清楚，也不可能知晓。我们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之后，我们最初想的是，我们这下可以翻

身了，再不会被打成“反党集团”，被开除出党了。而大字报被毛泽东利用，进一步在全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巨浪，造成十年之久的大动乱，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这的确是我们无法预料的。

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一事，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们本不想再谈及此事。然而，多年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中央理论调查组曹轶欧授意的，是康生、曹轶欧幕后策划、“指示泡制出来的”。对这种说法我们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加以澄清，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

《聂元梓回忆录》（第115～117页）里说，在我们已讨论决定写大字报之后，她曾和杨克明一起，经中央理论调查组张恩慈联系，见到了曹轶欧，向她请示、询问，是否可以给北大党委、陆平贴大字报，曹的回答是：“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写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谈话并未涉及大字报的具体内容，要写些什么？怎么写？仅仅是“可不可以贴大字报”而已。要在北大校园里公开给校党委书记贴大字报，事关重大。聂元梓作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按党的组织原则，请示一下上级领导，只是为了做到心中有数，更稳妥而已，这是很正常的事。谈不上曹轶欧“指使”，更谈不上是康生幕后策划、“指示泡制出来的”。我们集体讨论决定写大字报、写什么内容在先，聂元梓向中央理论调查组询问在后。《聂元梓回忆录》里说，她和杨克明请示曹轶欧的事，回来向我们说了，这是她记忆错误。在我们写大字报的整个过程中，聂元梓从未透露过她去询问曹轶欧一事。我们还是后来看到她的回忆录时才知道这个情况的。也就是说，我们写大字报没有任何人授意，没受任何人指使，完全是我们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和北大的实际，自行讨论、决定，并付之行动的，这就是我们亲历写大字报的历史事实。

还有一件事可以作为佐证：大字报贴出的傍晚就遭到有组织的围攻。晚饭后夏剑彘曾去一院找中央理论调查组的张恩慈（他住在一院），向他反映大字报被围攻的情况。张当即批评道：“你们为什么让聂元梓第一个签名？！你们不知道树大招风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央理论调查组并没有指使聂元梓，让她牵头写大字报。

以上就是我们亲历的第一张大字报产生的过程。我们两人都年逾八旬，我们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本着尊重历史，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把我们亲身经历的事实写出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供文革历史研究者参考。■

〔附录〕 第一张大字报全文

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做，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珏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做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

烈起来响应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赵正义 宋一秀

杨克明 夏剑勇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专稿】

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分析、论证方法与文风

向南雷

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一篇反驳性的议论/说理文，作者试图通过反驳宋、陆、彭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大字报分成三部分，前三个自然段是第一部分，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介绍了全国开展文革的大好形势，与北大的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做对比。由此提出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并得出“这里有鬼”的结论。为了说明“鬼”的存在，作者列出了事实，即第一部分的第二个内容——宋硕（北京市委大学

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以及“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对北大运动的布置。”大字报质问宋、陆、彭：“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这个肯定式的反问表达的是否定：“不是！绝对不是！”大字报随即拿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大字报的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是对上述结论的具体论证。大字报的第三部分是结尾，作者们号召革命的知识分子起来战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聂元梓提议修改的就是这一段。

这里分析大字报的第二部分。这部分包括四个自然段，每段都以引述宋、陆的讲话开头，然后拿出论点、论据加以反驳。

第一段从斗争的性质切入：

大字报引用宋硕的话：“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做得很细致”。

大字报的论点：反击黑帮不是理论、言论问题，而是政治斗争。宋陆彭把政治斗争引向了邪路。作者们提出论据：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

第二段说的是斗争的方向：

大字报引用宋的讲话：“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

大字报的论点：“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作者们提出论据：你们树立为“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就是法律系查了1500卷书，1400万字的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作者们由此得出结论：“你们跟邓拓黑帮一样。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

第三段说的是斗争方法：

大字报引用陆平的讲话：“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

大字报的论点：反击黑帮是阶级斗争，必须发动群众，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群众战斗形式。为什么开大会，写大字报最好？作者们提出权威论据：这是毛说的。作者们得出结论：宋陆彭压制、不准、反对群众革命。

第四段说的是领导问题。

大字报在引用宋硕的话：“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之后，拿出自己的论点：这是破坏文化革命。作者们没有拿出什么论据，从论点直达结论。

据说，这张大字报是“仿照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笔法”，“逐一驳斥对方观点”。¹即先把反对者的观点亮出来，然后再摆出事实论据或权威论据一一加以反驳。问题是，这张大字报的论点论据全部来自《五一六通知》和当时的报纸社论，其论点之荒谬，论据之虚假，概念之含糊混乱，使这个被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成为名副其实的虚假判断和错误观念的集合体。

宋、陆、彭虽然也站在“反修防修”的立场上，拥护文化革命。但是他们的上述说法有稳定局势，防止动乱的积极意义。论据是论证的基础，论题的真实性依赖论据的真实性，虚假不实的论据，只能导致论证的不堪一击。

除了论点论据的先天缺陷之外，这张大字报的文风也很值得一说。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1) 只有结论，没有论证。大字报常常从论点直接到结论，中间没有论据，只有不容置辩的断语。如：“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2) 歪曲原意，强词夺理。宋硕说“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逻辑

¹ 印红标：《“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7期。

辑上讲，宋的这一表述并没有把斗争仅限于理论、言论而排除政治斗争的意思。而大字报却这样质问讲话者：“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宋硕说：“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里的“正确的道路”，“正确的发展”，并没有说就是“纯理论”。而大字报却质问：“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到纯理论的圈套里去。”

3) 妖魔化。大字报在语气上，把对方视为敌人，仿佛自己是居高临下的审判者，是社会正义的最高代表。如：“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大字报在用词上也以丑化对方为能事：“你们大喊，暴露了你们的马脚。”“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负隅顽抗”、“牛鬼蛇神”、“做白日梦”等。

4) 质问/警告：大字报有很多问句，且多是反问。语气咄咄逼人，“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大字报还用了不少带有威胁性的警告语：“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我们绝对不答应！”“告诉你们，这是做白日梦！”这张大字报加标题、作者名及后面的标语，共有1840个字符，其中有19个问号，10个惊叹号。

从论证/说理方法上看，七人大字报更像是5月8日《解放军报》刊发的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光明日报》何明（实则关锋）《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以及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5月11日《红旗》杂志上，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而这些大批判文章的论说方式和语言文风又都受惠于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事实上，毛五十年代的著述，多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发展。它对五六十年代的“四大”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尤其是1964年发起的思想文化批

判有着深重的影响。

“这张大字报的播发，使北京的各个大、中学校都轰动起来，成千上万的大字报象雨后春笋般地在校中破土而出。几天之后，不仅北京，而且是全中国的学校乃至工厂，各种反对修正主义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中华大地。”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了好多假话，但是上面这段话反映的却是真实情况。¹需要补充的是，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内容到语气，从用词到文风都是这七人大字报的翻版。由论点直达结论、歪曲原意、扣大帽子、妖魔化、威胁式等等，成为文革十年的主流文风。即使在后毛时代，这种文风在互联网、微信群，以至官方报刊中时时可见。■

【专稿】

关于第一张大字报的争论

——“策划指使说”与“推动支持说”浅析

姜学斋

关于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以北大教授印红标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推动支持说”。²以前北大党委副书记王效挺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策划指使说”。³本文先把这两种观点摆出来，然后说说我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一、两种观点的交锋

¹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页420，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

² 印红标的有关文章有两篇，一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发表在《百年潮》1999年第7期；二是《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发表在《文史精华》，2004年第1期。

³ 持此观点的主要有三个人，王效挺、黄文一和李海文。王效挺、黄文一的有关文章主要有：署名为“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效挺、黄文一”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发表于上海的《世纪》，2003年第1期，该刊注明：王效挺为北大原党委副书记，黄文一为北大校办副主任。署名为王效挺、黄文一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文章，发表于《文史精华》，2005年第12期。李海文的代表作是《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发表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印认为：“大字报由聂元梓等人自己发起，康生和曹轶欧给予了推动和支持。大字报贴出以后，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作出广播和发表这张大字报的决策，使其具有了全局性的影响。”其证据是1993、1995和2001年大字报撰稿人的口述。“六人都十分肯定地对笔者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¹

以前北大党委副书记王效挺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策划指使说”。他们认为，“大字报是康生和曹轶欧策划、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人写的。”²印红标等人提出的“推动支持说”，违反了中央的结论，“混淆是非，为康生、曹轶欧开脱罪责”。³王效挺等人的根据主要是1967年康生的两次自我表白，杨克明1967年给中央文革写的报告，陈守一1978年写的揭发材料、刘仰峤（康生调查组副组长）1979年写的材料，白晨曦（北大人事处副处长）1979年写的材料，某党员1980年写的材料：1978、1979、1980年间张恩慈、杨克明、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聂元梓等人给校党委写的交代材料。

在对这些证据做了辨析之后，印对其可信性提出了质疑：关于陈守一、某党员，以及张恩慈、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写的交代材料，印红标认为，第一，这些材料并不能作为“策划指使说”的直接证据。第二，这些材料是当事人在文革结束后，为校党委的政治审查写的交代材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作者势必要顺应上面的意思，因此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为了证明康生的“策划指使”，王效挺还引用了聂元梓回忆的原话——“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作为佐证。印红标认为，这一引证中的“要”字是引者另加的，“作为主要证据的引文应当是原文，万不得已加字，也必须有足够的佐证，以避免曲解。”王文“在没有举出佐证的情况下加上‘要’字，至少不够严谨。”

在引述、分析了聂的回忆录之后，印得出结论：“写大字报的动议是聂元梓之外的其他教员提出的，经聂元梓‘请示’曹轶欧，曹表示了认可。聂元梓与曹轶欧两次谈北京大

¹ 印红标：《“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7期。

² 王效挺、黄文一：《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文史精华》2005年12月。

³ 同上。

学的问题，可以说明曹轶欧对聂元梓等人大字报起了推动和支持的作用，但是难以作为‘指使’的充分证据。”

针对“策划指使说”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杨克明和张恩慈的口述。印红标在引述了张恩慈的话——“曹轶欧没有指示我去找人写大字报。杨克明来找我说要写个关于北大四清的材料，我说写材料没有用，北京市委都有人写大字报了”——之后指出：“他们谈话的主题是北大‘社教’，不是后来聂元梓等人大字报所写的‘文革’问题。两个问题批判的矛头虽然都指向北大党委以及北京市委领导，但是毕竟不相同。如果把这次谈话算作授意的关键步骤，岂不是‘种瓜得豆’的逻辑？”

关于康生1967年的两次表白，印认为，康生所说的“促进”，从语义上只能理解成“促进和推动””关于刘仰峤和白晨曦的证词，印通过引用张恩慈的话，否定了此二人的说法。印并指出，刘、白二人已死，死无对证。

至此，印红标得出结论：大字报的内容是杨克明、聂元梓等人自己提议、讨论决定的。他们先是想写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意见，经过讨论决定写现实的文革问题，没有调查组的人参加讨论。现有的资料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而王效挺等人没有就指使的内容提出证据。大字报最重要的是内容，如果内容是自己决定，而非授意的，那么策划指使之说就成了问题。

二、“策划指使说”对“促动”一词及相关史料的解读

2005年，王效挺等人再次撰文《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反驳印红标。王没有提供新的资料，文章的重点放在对前引资料的解读和推测之上。王认为：

第一，关于“促动”的两种解读。印红标认为：康生“没有用‘发动’，而是‘促动’即促进和推动”的意思。王效挺等人则认为，“促动”同样可以解读为“督促和发动”。

“文革中和文革后，一般都认为康生的话是对他炮制大字报的‘自白’和‘不打自招’，

就是从‘督促和发动’意义上理解的。”印认为，康生和曹轶欧是在“哲学系少数教师发起”后，才“给予了推动和支持”。¹王反驳说，从康生的“自白”中看不出印说的“事后推动”、“事后支持”的意思。

第二，聂元梓对曹轶欧动员她揭发陆平的态度。王效挺等人认为，因为聂时刻想翻社教的案。所以当曹“动员她继续和陆平斗争”时，她必然会积极配合。而不会如印文所说的那样“心灰意冷”。王提出三个证据：（一）聂从曹处回来后，要白副处长给她准备材料，她要向中央写信“揭发陆平”。（二）聂在2003年的回忆中说：“这是康生插手北大的险恶手段，他知道北大存在严重矛盾，就像苍蝇一样，也要叮北大这个‘有缝的鸡蛋’了。”（三）曹轶欧动员北大法律系主任陈守一和聂元梓等人共同来揭发陆平、宋硕。“如果聂元梓真如印文所说的那样‘心灰意冷’，对曹‘态度冷淡’，曹就不会让陈‘领头和聂元梓共同来搞。’”

第三，写大字报是曹轶欧/康生先提出来的。王认为，写大字报与康生和调查组对大字报方式的肯定有直接关系。王举了1978年和1980年间杨克明、赵正义、张恩慈和某党员写的材料。证明写大字报的主意来自康生调查组的张恩慈。而北大人事处白副处长和调查组副组长刘仰峤1979年写的材料都证明，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出笼的。因此印的“自发论”是不成立的。

第四，杨克明1967年的报告。王认为，杨克明1967年写的《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的专题报告中说，“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做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

第五，关于最重要的大字报的内容。印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王效挺认为，康生指使炮制了这一大字报，那么，他们当然应该知道大字报的具体内容。曹了解北大的事，应该知道聂等人写的是什麼内容。因此，康事先是否了解大字报的内容的问题根本无须讨论。

¹ 王效挺、黄文一：《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文史精华》2005年12期。

自王效挺等人发表了《再考订》一文之后，印没有回应王，学界也没有人再为“推动支持说”说话。中央党校教授李海文2009年撰文，支持王效挺的说法，但李文没有提供有值的史料。

三、“策划指使说”浅析

下面试就王效挺等人的主要观点，做一粗浅的分析——

第一，关于康生的说法。印红标认为：康生“没有用‘发动’，而是‘促动’即促进和推动”的意思。王效挺则认为，“促动”同样可以解读为“督促和发动”。“文革中和文革后，一般都认为康生的话是对他炮制大字报的‘自白’和‘不打自招’，就是从‘督促和发动’意义上理解的。”印认为，康生和曹轶欧是在“哲学系少数教师发起”后，才“给予了推动和支持”。王反驳说，从康生的“自白”中看不出印说的“事后推动”、“事后支持”的意思。¹ 这涉及到三个问题：

（一）怎么理解康生所说的“促动”？依照《现代汉语词典》，“促”的本义是“催，推动”。印红标把“促动”解释为“促进和推动”是“促动”的本义。王效挺把“促动”解释为“督促和发动”偏离了这个词的本义。王质问印：“‘促动’解读为‘督促和发动’有何不可呢？”从语义学来说，这种解读是不可以的。王说人们都是从‘督促和发动’意义上理解的康生所说的“促动”的。这是主观性的说法。

（二）康生的话里有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康生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这句话里确实看不出有印说的“事后推动”、“事后支持”的意思，但是，这里也同样看不出王所希望的“事先策划”，“事先指使”的意思。

（三）王效挺说，“文革中和文革后，一般都认为康生的话是对他炮制大字报的‘自白’和‘不打自招’，就是从‘督促和发动’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说法值得商榷，首先，

¹ 王效挺、黄文一：《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文史精华，2005年12期。

不宜把“一般”的看法当做判断事物真伪的标准和根据。举几个例子：文革中，一般都认为文革成绩大大，光辉无比。文革后，一般都认为，文革是浩劫，应该彻底否定。文革中，一般都认为，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文革后，一般都认为，刘少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九一三”以前，一般都认为，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且都祝愿他永远健康。“九一三”以后，一般都认为，林彪阴谋篡党夺权，终至叛国投敌，因此死有余辜……。总之，“一般”的看法是不稳定的，随时而变的，因而王效挺把一般认为作为判断康生策划指使了第一张大字的根据，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王效挺认为，聂元梓对曹轶欧动员应该积极配合，而不像印说的那样“态度冷淡”。这种看法恐怕简单化、绝对化了。实际上，聂对曹，对翻社教案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在五一六通知传达前，她对学校的事“心灰意冷”，对曹的动员“态度冷淡”。听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后，她才积极起来。这一点印红标在2004年的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王提出的三个证据，至少后两个没有说服力——聂关于康生插手北大的叙述与她对曹之动员的态度无关。而曹轶欧动员陈守一和聂元梓一道共同来揭发陆平，可以有多种理解。王的解读只是一家之言。如果把这件事解读成曹轶欧想通过陈守一来改变态度冷淡的聂元梓，同样可以成立。

第三，写大字报是谁先提出的？王效挺认为，写大字报与康生和调查组对大字报方式的肯定有直接关系。他举了1978和1980年杨克明、赵正义、张恩慈和某党员写的材料。证明写大字报的主意来自康生调查组的张恩慈。而北大人事处白副处长（白晨曦）和调查组副组长刘仰峤1979年写的材料则证明，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出笼的。王效挺的意思是，张恩慈是调查组的红人，他的思想言行一定代表康、曹。

印红标的文章说，他采访张恩慈时，张坚决否认白、刘的这种说法。而“刘、白二人都已经过世”，“不能再核实”，“十分遗憾”。王效挺质问道：“难道这两位干部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听到同一人同样内容的讲话，就能够因一人否认而否定吗？两人已故，档案犹存，岂能以‘遗憾’了结。”印没有正面回答王的这个质问，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讲

他的观点：1967年当时“大字报的署名人分属两派，双方为写大字报之事争功，竞相攀附‘无产阶级司令部’做政治靠山。为派性利益而写的文字往往有或夸大其词或隐瞒真相的失真之处。”王反驳印，把大字报主要作者的这封信，说成“为派性利益”“争功”“攀附”，这种“奇特的解读”“不但是对事实的严重曲解，而且是对写信人的极不礼貌、极不尊重的表现。”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评价白晨曦和刘仰峤1979年写的材料的真实性？换一句话说，是张恩慈对，还是白、刘对。二是杨克明、赵正义这些当事人的说法的真实性如何？是否会因时而易，受派性影响？

关于一，我的看法是，文革后，党员干部为组织写的材料，都免不了带上功利心和时代性，功利心表现在写对自己有利，不写或少写有害或没利的。时代性表现在，写材料者要附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按着主流和组织的意思写。因此，白晨曦和刘仰峤1979年写的材料的真实性是不可靠的。也就是说，“档案”并不能作为不可动摇的证据。

关于二，印红标说的两派争功，竞相攀附是合乎情理的。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很常见。既不能算是“奇特的解读”，也不宜说扯到“对写信人的极不礼貌、极不尊重”上面。

四、“策划指使说”的发轫与影响

“策划指使说”的最早版本来自1978年12月21日北京大学校刊《北京大学》发表的李南强的文章《一根上逼中央下扫全国的大棒——评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¹。两年后，这一说法写进了中共中央文件——1980年10月16日中央批转的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说：康生政治品质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康生的《悼

¹ 印红标曾打电话向李南强先生询问资料依据。李回答说，关于康生、曹轶欧与聂元梓等人活动的描述，系根据校党委提供的资料，不是他本人的亲眼亲历。见印红标：《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文史精华》，2004年第1期。

词》，并向全党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和其妻曹轶欧的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

使“策划指使说”广为人知的，是1981年1月8日《北京日报》发表记者林浩基采访北京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的文章——《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此文沿袭了李南强的说法，将不便公开的康生罪行对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笼做了这样的描述：1966年5月14日康生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带调查组到北大。康生和曹轶欧多次与聂元梓密谈，达成反革命政治交易。“五月下旬，‘调查组’亲自出马，召集北大一些人开会，直接授意写大字报。大字报写什么内容，他们煞费了一番苦心。开始，他们准备翻北大社教的案，但感到马上把锋芒指向中央，时机还不成熟，不如从市委下手容易得逞。”文章又说：“聂元梓根据曹轶欧这个调子，同其他几个人一起密商、起草大字报。他们两易其稿，终于炮制了出来”。¹ 文章对大字报的定位是：康生指使其妻曹轶欧“精心策划，点火北大，上整市委、中央，搞乱全国的重大阴谋”。

此后的官方撰述都沿袭了“策划指使说”这一说法。

五、三个问题

“策划指使说”与“推动支持说”之争，关涉到三个问题：

第一，对史实辨析。提供史料的原因/动机（是组织要求写的，还是个人行为）；提供者的政治面貌（党员还是群众）、思想倾向（是官方立场，还是独立的学术立场）、职务（是干部、领导干部还是普遍公职人员）、境况（是组织审查期间，还是组织已经做了结论；是还在职，还是已退休。）、提供时间（是文革中，文革结束后几年，还是九十年代以后）等因素与史料的真实性都有关系。情况不同，提供者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有三个时间——文革期间，大字报被肯定，康生为自己揽功，杨克明等人也不反对指使说。文革刚

¹ 见印红标：《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文史精华》，2004年第1期。

结束，大字报被否定。当事人愿意把责任推给康，也有利于指使说。文革结束多年后。没有了利害关系，当事人所说更接近真相。

第二，对史料的解读。与提供者一样，史料的解读者也会因为动机、政治立场、思维方式、职务、解读时的境况之不同，而有所不同。王效挺离休前是北大党委副书记，黄文一是校办副主任，退下来之后，王又是北大校史党史组的研究员，他们站在维护中共中央文件精神的上场上说话，从政治上看问题，其解读和结论自然是站在官方立场上的。

王效挺等人的动机、立场与印红标不同。印在2004年的文章一开头就提出“我们讨论的是‘学术问题’，应‘尊重学术自由、学者尊严’”。王貌似同意印的意见，但指出，“讨论的是名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第三名骨干成员、罪大恶极的康生的一条罪行，这是个政治性很强的问题。我们前文认为印先生在根据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否定康生的一项罪行，会‘起到混淆是非，为康生、曹轶欧开脱罪责的不良影响’。”也就是说，王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了印。在他看来，如果讨论的对象是“政治性很强的问题”时，就不能用学术讨论“来否定中央的定论。”

王效挺等人的思维方式也与印不同。印提出学术讨论，不要用“文革思维方式”。王认为，“文革思维模式”“文革语言和思维模式可以举出许多，但最主要的是两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显而易见，王所说的文革思维模式，与印说的不是一回事。印所说的思维模式，学术为政治服务，用政治大帽子（“混淆是非，为康生、曹轶欧开脱罪责”）压人。

第三，如何看待来自官方的资料。王效挺大量引证文革后相关人士写给官方的材料。包括中央专案组审查康生时的资料。认为这些资料是可靠的，实事求是的。印过份地相信20年后个人对一些当事人的访谈。“对康生专案审查期间的资料却从各个方面提出怀疑”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上面已经做了回答。这里再做点补充，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为了证明江青是叛徒，将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领导徐明清抓到秦城，逼其做伪证，徐明清于1977年1月8日被迫写了一份假交代。两个月后——1977年3月6日，她

的假交代被影印收入“红头”文件之中，印发全国。文件加了按语：“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10月，她（指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这件事在徐明清的回忆录《明清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和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中都有详细记载。这两本书都是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再四审查后才批准付梓的，建议王效挺找来读一读。

六、小结

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之处在于大字报的主使者、创意者是谁？是康生、曹轶欧，还是聂元梓等人自己？”¹如果大字报的主使者、创意者是康/曹，那么，说大字报的产生是康生指使其妻曹轶欧“精心策划，点火北大，上整市委、中央，搞乱全国的重大阴谋”²的说法就能成立。中共中央1980年给康生开列的“指使炮制”第一张大字报的罪名就属实。³如果大字报是聂元梓等人的自发行为，康/曹不过是通过张恩慈推动和支持。那么，上述说法就不成立，中央给康生开列的有关罪名就不属实。这正是官方学者要竭力坚持“策划指使说”的根本原因。因为“策划指使说”意味着，康生（曹）利用聂元梓等人，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文革邪火。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康生是罪魁祸首，毛泽东被康生利用。

“推动支持说”把聂元梓等七人的行为，说成是自发。这种说法与官方相抵牾，第一，它否定了聂元梓与康生的勾结，也就否定了80年邓小平对聂的部分指控。换句话说，它在

¹ 印红标：《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文史精华》，2004/1期。

² 《北京日报》记者林浩基对北京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的访谈录《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载《北京日报》1981年1月8日。

³ 中共中央文件——1980年10月16日中央批转的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说：康生政治品质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并向全党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和其妻曹轶欧的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

暗示，中共中央对聂的审判是不公正的，聂系狱十七年在一定程度上是冤枉的。第二，它否定了康生与第一张大字报产生的直接关系，减轻了康生的罪责。也就意味着中央对康生的结论在这方面是不真实的，是有错误的。

王效挺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推动支持说”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为康生、曹轶欧开脱罪责”。如果在“精心策划，点火北大，上整市委、中央，搞乱全国”这个“重大阴谋”中，康/曹只是一对跑腿的小角色，只能承担一小部分罪责；那么，做决策的大角色，康/曹后面的大老板就应该承担主要罪责。

把康生说成了第一张大字报的主使者、创意者，其实就是让他与林彪、“四人帮”一样，为毛泽东承担罪责。“推动支持说”有损于毛的形象，有违于邓小平对文革的结论，不符合后毛时代的政治理念。也就是说，在这分歧后面，是一个肯定与否定中央结论的斗争。由此，我们可以明了，为什么自王效挺等人发表了《再考订》一文之后，印红标没有回应，学界也没有人再为“推动支持说”说话。■

【评论】

论“政治倾向性”

宫香政

北大校友俞小平曾在《记忆》上发表文章说：“在文革结束后，井冈山成员没有一个被判刑或定为‘三种人’，这在高校群众组织中是罕见的”。

俞文这段话是事实。俞文在这里向读者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是：经过邓小平的清算，证明聂元梓及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错误的，而对立派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正确的。然而，俞小平却隐瞒了造成这种政治结果的背景和一系列的隐情。

王若水先生说：“文革结束后，那些受打击的老干部纷纷复职，重新掌权，给文革做结论的正是这些人。他们要全面否定文革，但又要保护毛泽东。他们不但要惩治林、江集团，也要惩罚所有那些反对过自己的‘造反派’”。（聂元梓回忆录3页）

“永不翻案”的邓小平正是这样的人。他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参与决策者之一（“五一·六通知”和“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他是和刘少奇共同领导、指挥初期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人物，他们派出的工作组在北大揪出了二百多名所谓“黑帮”，在北大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政治排队”，划分左、中、右，抓“游鱼”，意欲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搞成第二次反右派斗争；他和刘少奇又是深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人物，只是由于毛泽东对他网开一面，使他免遭刘少奇那样悲惨下场。他在心里怨恨毛泽东，对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否定的，但为了维护党的形象和执政的合法性，他说“不写和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错误”，陈云说“对毛主席的评价要一锤子敲，否则我们这些人也会被否定”。（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

在上层，他最恨的是江青，他要判江青死刑，陈云听到后，严肃地说：我不同意判江青死刑，（我的意见）要写进史书，邓小平才改变了原来的主意。

在下层，他最恨的是聂元梓，他说，“看到邓朴芳，就想起聂元梓”。

在社会上邓小平最恨的是“天派”，所以，首先逮捕判刑的对象是‘天派’的代表人物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1983年3月17日《北京日报》报道说：“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依法分别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蒯大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韩爱晶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陈云得到消息后不满地说：“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邓小平只好又将“地派”头头逮捕判刑（谭厚兰因为身患癌症，免于起诉）。时隔五个月，1983年8月18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大宾进行宣判，判处王大宾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通过以上事实，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清算文革时，政治倾向和感情色彩是非常鲜明的。

文革前，北大社教运动“翻烧饼”，始作俑者是邓小平和彭真，在他们的支持下，镇压了北大社教运动的“左派”；文革中，“左派”们起来，造了陆平校党委的反，许多党委成员，被戴上了“黑帮分子”的帽子，受到冲击和迫害。文革结束，邓小平和彭真上台后，他们又要把这个烧饼再翻过来，清算那些敢于和他们作对的“左派”分子。邓小平派出他的老部下、原贵州省委书记周林来北大整肃聂元梓一派；彭真也派出了他的老部下项子明，来北大整肃聂元梓一派。项子明文革前是彭真的秘书，文革中他遵照“5.16通知”精神，对彭真进行了揭发，文革后派他来北大也是对他的一种考验。所以在北大整肃过程

中，大整聂元梓及支持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成员，就不足为奇了。

在聂元梓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的、原山西省副省长刘贯一同志给胡耀邦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对聂元梓判刑）是彭真同志指示判刑的。现引用一位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来证明，时间是对聂刚判刑不久。

记者问：“聂元梓的问题是怎么回事？”（指怎么判那么多年？）

负责人说：“我们不主张判刑。”

记者说：“那怎么判那么多年？”

负责人说：“彭真同志讲：‘这样的人不判刑什么样的人判刑？’我说：‘那判十年吧。’但彭真同志说：‘不行，判十七年。’我表示不好执行，认为没有什么依据，对彭真同志说：‘林、江主犯判十七年，这（聂元梓）总算是追随吧。’但彭真同志不同意，说：‘那有什么标准！’”

就这样以政治局名义下达政法委员会执行的。（《聂元梓回忆录》10——11页）

在那“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的时代，有什么“法治”可言？！彭真是搞政法的，他在文革中深受不讲“法治”之害。但是，一旦他掌了权，就无“法”可言了，他的话就是“法”。

北大的王学珍、王效廷二位校领导，原为陆平校党委的重要成员，文革中也受到冲击和迫害。文革结束后，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他们主持编写的《北京大学纪事》中，就有两种硬伤，一种是：“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尊者讳”。为了维护领导人形象，他们隐瞒了许多史实，有一些史实他们不敢写出来；第二种是：关于文革时期纪事，存在许多不实之处，并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感情色彩。在清查“三种人”过程中，以王学珍为书记的校党委，承接了迟群、谢静宜镇压聂元梓及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成员所网罗的不实的材料，发往全国各地，我本人就是受害者之一。

在邓小平清算文革时，井冈山方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受到清算处理呢？这后面有很深的政治背景。王大宾感慨评说：“有人对‘西游记’评论说的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没有背景的妖怪都被孙悟空打死了。”（《王大宾回忆录》12页）

由于俞小平校友提到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谈谈我所了解的牛辉林同学的情况。牛辉林同学是井冈山兵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在邓小平清算文革过程中也波及到他。由于他智商好，情商高，总能逢凶化吉。

文革初期，当聂元梓红的发紫时，他紧跟聂元梓；

当王、关、戚得势时，他投靠了王、关、戚的亲信洪涛、刘郅；

当迟群、谢静宜在北大不可一世时，他积极靠拢迟群、谢静宜。在张木生先生所写的“山西出了个牛辉林”一文中，对牛辉林与谢静宜热情的谈话有生动的叙述。在迟群、谢静宜的威逼利诱下，他成为迟、谢树立的“宽严典型”。在办公楼礼堂当众承认自己在洪涛、刘郅的鼓动下在北大挑起武斗；说了一些江青同志的坏话；违心地承认自己被洪涛发展为“5.16分子”，他在北大也发展了其他人加入了“5.16”组织。

“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后，他又与邓家拉上了关系。2011年，我在网上见到一则消息，说的是“文革中，在北大，牛辉林是唯一正确的人”，又说“山西省原来要把他定为‘三种人’，是中组部开出证明信，证明牛辉林不是‘三种人’，使他免遭一劫。”网上的消息，未必可信。但是，牛辉林同学能够参加邓小平夫人卓琳的追悼会，那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吧。

是非对错，不在于巧言令色。只要摆出事实真相，我想每一位读者心中都会有一台正义的法律天平。■

2017.7

【述 往】

我与北师大

——开学后的“专业思想教育”（一）

蒋世信

我在张家口一中上到高三，因母病休学三个多月。母亲去世后，我又恶补落下的功课，终于赶上了高考。1964年6月填报高考志愿，我第一志愿报的清华，第三志愿报的北师大，第十志愿报的是合肥工大。班主任说我适合报师大，开始我没在意，后来才知道，从1964年开始，全国贯彻阶级路线，学校政工组可以根据内定政策更改学生的志愿。政审不合格的，如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的子女，政治组根本不通知本人，就在他们的

档案盖上“不予录取”的红章，考得再好也别想上大学。我算幸运，虽然大哥蒙难劳改，但还不在“不予录取”之列。八月下旬录取通知来了，我考上了第三志愿。虽然不是特别高兴，但毕竟回了老家，而且是“吃饭大学”，生活有了保障。

八月廿五、廿六是北师大新生报到的日子，廿五号那天清晨，我是和六零年从一中考上清华大学数学力学系的刘志武大哥（我们是两家不远的邻居）一起乘火车去北京的，到了清华园我们下了火车（我买的车票是西直门站），他把我又送上31路公交车直达北师大。恰巧车上有位体育系的高年级同学，他帮我拿着行李下了车、嘴里喊着“来了位数学系新生”，师大校门红旗招展、横幅写着“欢迎你，新同学”，迎新的数学系同学连忙接过我的行李，并陪我去迎新饭厅就餐和安排住宿。

连续几个晚上，师大的操场都有电影放映和京剧演出，9月1号开学典礼，我们新生安排在有舞台兼主席台的主会场——北饭厅。那天，陈垣老校长出席了开学典礼，陈垣校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四方脸、白胡子、慈眉善目的。老同学说：“你们真运气，我们都入学两年了才第一次见到陈垣老校长。”

开学典礼的迎新会结束后，我们回到宿舍。程今吾副校长（党委书记）的讲话仍回响在耳旁：“从今年开始，我们学校每年都要对入学新生进行作文考试，不及格的要办语文学习班，一直补习到及格为止……。”

“难道通过了高考还不算合格？”我问宿舍里的同学。

“你没听见校长讲作文考试的意义吗？”

“我，……，我光顾琢磨如何通过作文考试了。”我赶紧为自己解释。

“那你去问校长吧！”同学们开着玩笑。

过了十几天，也真巧，晚饭后我和同学到绿园散步，迎面遇上了程副校长。

“您好！程校长。”

“吃过晚饭啦，你们是哪个系的？”

“数学系新生。”我抢着说。

“噢！通过作文考试啦？”

“通过了。”

“有没通过的？”

“我们班有三个。”

“三个？！请你转告他们，数学系也要学好语文，语文学不好数学也学不好，将来工作也做不好。”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竟五十多年了，可是程副校长的话一直牢牢记在我的心里。多年来，每当我接一个新班时，总要跟学生说：“别看我是教数学的，我要求你们一定要把语文学好，语文学不好，数学也学不好，将来工作也做不好。……”

不仅要求学生重视语文，我自己也注意文字功夫。从1982年起，我先后在中学数学教学杂志上发表文章60余篇（其中《数学通报》10篇），并多篇在北京市及全国中学数学教学研讨会上获奖，这要感谢程校长及母校的教诲与培养。虽然我已退休并回到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北城居住，安逸、悠闲，但我还不时地写点什么，为中等教育增砖添瓦。

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天南海北，大家自报家门很快就认识了。

开学第一周是“专业思想教育”，原来考入北师大的学生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不是第一志愿，因种种原因而被师大录取。记得数学系总支书记王树人、团委书记胡祖莹，先后在年级会上大谈特谈巩固专业思想：北师大是培养大学教师和中学骨干教师的，能上大学是百里挑一，能从1500万青年中选出15万接受高等教育，要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人民给予的上学机会。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扎实功底的教育教学能力等等。然后批判轻视教育的错误思想，还列举了往届一些同学接到师大录取通知书时的心态：“欲笑无声、欲哭无泪，处于哭笑之间了。”

啊！这不是在说我吗？太形象了。于是将这段话记下并转抄在我给一中蒋观河老师的信中，述说我当时的苦闷心情。有意思且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蒋老师没有回信却将我的信上交给学校领导，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安启堂副校长点名批评了我。是啊，老师培养教育了我，我却不喜欢教师工作，太应该受到严厉批评。

其实，教师是非常重要的职业，重视教育国家才有希望。因为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国宝’、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人才需要社会、学校与教师着力培养，只有人才济济的国家才能永远不败地立于世界之林。

此文选自作者的自印书《忆海拾零》第十二节“大学时代”

【述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五）

——逝者血泪·胡锡奎之死

陆伟国

遭到厄运的，不但有现任校领导，连已在1964年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原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也未能幸免。

一、早年投身革命



胡锡奎是湖北省孝感县人，1896年生，青年时代就开始革命活动。他两度发起组织孝感县暑期学校，并被推选为校长，在青年中宣传革命思想，还参与组织孝感市民响应“五卅”运动的反帝示威游行。一九二五年，他到南京东南大学学习，并在年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反动军警的注意。一九二六年，被下令通缉。他转移到上海，很快，党中央派（胡锡奎，1896-1970）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列席了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派遣回国，在上海的中央组织部做地下交通工作，不久又被派往北方，先后担任过唐山市委书记和北平市委书记。

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一九三一年六月，胡锡奎被捕入狱，关进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军人反省院。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坚持斗争，是当时狱中党支部负责人之一，曾被三次判处死刑而不惧。

1936年春天，刘少奇化名胡服，作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到达天津。他深感这时

的华北地区形势紧迫而干部严重缺乏，当得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认为如果能将这批党员营救出狱，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便专门为此请示中央。在接到中央的同意批复后，交由当时的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去具体办理。于是，从1936年8月底到1937年3月，狱中的共产党员六十多人分9批履行国民党指定的出狱手续，签字画押后陆续出狱，其中就有胡锡奎。这批人在后来的革命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乎都担任了高级干部。

但到了“文革”，“四人帮”和康生翻手为云，为配合打倒刘少奇，就说这些人出狱是叛变。1967年3月16日，薄一波等这批人被正式定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都遭到了残酷迫害，有十几个人（包括胡锡奎在内）死于非命。尽管1943年3月，薄一波去延安曾向毛泽东谈了1936年履行手续出狱的经过，毛泽东表示知道此事。文革中却依然有此变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六十一人案”才得以平反。

三、冀东暴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锡奎担任冀东特委书记兼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他化名王端清，和李运昌、李楚离、王仲华等一起，于1938年7月组织和领导了冀东二十二县十多万人的武装暴动。起义队伍占领了六座县城，摧毁了十九个县的敌伪政权，建立起七万人的抗日武装。这次起义震动了全国，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抗战。尽管起义队伍在后来向西部山区转移过程中（史称“平西大撤退”），由于经验不足、指挥失误等原因于当年10月间遭到了毁灭性的惨痛失败，但它的意义依然不能低估。

四、首印毛选

从一九三九年到抗战胜利，胡锡奎一直在晋察冀根据地，先后任北岳区党委和晋察

冀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任《晋察冀日报》社长。这期间，他还有件不一般的事情。一九四四年，他主持编辑印行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当时《晋察冀日报》的主编邓拓负责具体工作。

当年七月，这部《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发行。书中收集有29篇毛泽东的著作原文和注释。共印刷5000册，精装、平装各2500册。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该书为小32开，精装（布面）一册装订。平装分五卷装订，每卷封面用头号红色字体从右向左大字题名“毛泽东选集”，下署卷次。扉页后印有毛泽东肖像。全书约50万字。

五、人民大学工作期间

全国解放前夕，胡锡奎调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并主持工作。一九五〇年，在原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大的基础上，党中央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胡锡奎担任校党组书记兼副校长。在人大期间，胡锡奎工作是认真的努力的。但不必讳言的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出现了新的问题，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他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

人民大学的前身是华北大学，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延安的陕北公学。从陕北公学起，成仿吾一直担任校长。成仿吾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是中国新文学界的名人，以后又参加革命，参加长征，到延安后创办了陕北公学，后来到晋察冀边区担任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和边区的参议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都是吴玉章）。因此，成仿吾在中国文化教育界是颇有名声的。但中央对他并不十分重视，毛泽东，特别是刘少奇认为他政治上不强。而胡锡奎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大革命后到苏联留学，回国后担任过京津唐市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热河省委书记，创办华北革命大学时被任命为实际负责的副校长。他在总结“革大”的经验中说：“课堂就是战场”。毛泽东认为他把“革大”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经验总结得很好，批发给全党学习。人民大学成立后，中央任命胡锡

奎为党组书记，当第一把手，就是认为他政治上比成仿吾强，可以做吴玉章的得力助手。胡锡奎调人民大学时，从“革大”调来一批老干部（抗战初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作为人大的骨干力量。他们到人民大学后，与原来“华大”的干部作风大不相同。从“陕公”到“华大”的这批干部，来自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较多，被人们称为“洋包子”。在解放区，“洋包子”吃不开。但是，开办人民大学，请来大批苏联专家，情况发生了变化，“洋包子”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解放区存在的土洋矛盾，就更明显了。

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华大”干部和“革大”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是这一矛盾的某种反映。当然，这还只是浅层次的，藏在更深层次的矛盾则延续和影响了人民大学以后的几十年。那就是由历史形成的革命队伍里极为复杂的山头主义。更为复杂的情况是，这个问题有它的共性，还有特殊性。人民大学就有这个情况。虽然从延安来的山头，通常上面是器重的，但到了人大，成仿吾就不行。因为还有个由北方局形成的“华北山头”，胡锡奎大概是这条线的。到后来，还有教工中有接近北京市委和接近中宣部的不同说法，尽管到了文革，大家都翻了船。

到了1952年“三反”运动，由于对处理一些干部的不同想法，这一矛盾的发展就更为尖锐，使教学工作也无法正常进行。中央派安子文、胡乔木等来人大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解决问题。会上，胡乔木在严厉批评成仿吾时竟然情绪失控，对成声色俱厉，羞辱备至。结果自伤其身，当场引发胃出血，被紧急送往医院。会后，成仿吾被调到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当校长。这次调动祸兮福兮？历史还真是有几分诡异。二十五年后，到了1978年，人民大学重新恢复，成仿吾又回来当了校长。而胡锡奎却没等到那个时候，1970年，就死在了监狱里。

对于当时的人民大学来说，本来就对正规大学是外行的领导因此而更加外行了。之后，在人民大学“左”的灾难屡屡出现，比如1959年邹鲁风副校长的不幸自杀和六十年代初对

教学内容里“修正主义”的批判等等，尽管这些首先是大环境的因素，但应该说也有胡锡奎的个人责任。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高教部派工作组进驻人民大学，对“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的扩大化平反纠偏。这回儿是高教部长杨秀峰对胡锡奎进行严厉批评。校内几年来蓄积的不满至此爆发，校系各级负责人与教师纷起批判。1963年，不愿离开人大的胡锡奎被调到西北局任书记处书记，人大的工作由郭影秋接任。

六、文革遭遇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老革命，而且在人民大学的老一代干部教师中不少人至今觉得他当领导时是比较“左”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同样遭到左倾势力的残酷迫害。文革开始不久，极左势力就把矛头指向了胡锡奎。1967年3月3日，戚本禹来到人大，更是直截了当地讲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胡锡奎是人民大学的第三号敌人。

文革期间，“打倒孙郭胡”的口号，一直回荡在人大的上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锡奎在北京和西安之间被拉着来回批斗、游街、毒打达一百多次，多次昏倒在地。包括在人民大学的批斗。尤其是一九六八年初，他正式揭发了陈伯达的问题，被以“现行反革命”、“叛徒”的罪名投入监狱。在监狱中，他仍以顽强的意志进行斗争，曾铿锵有力地说：“我不是叛徒，更不是现行反革命”。

一九六九年，胡锡奎发生大吐血，拖延很长时间，才被送到监狱犯人医院，发现是早期胃癌，却不准动手术。相反，“四人帮”一伙多次对他进行“审讯”。每一次，他都忍受极大的病痛，被强令从“病房”走到“提审室”。当他最后病情恶化、生命垂危时，康生还授意，多次给他注射强心剂，进行惨无人道的“突击审讯”，要榨取尽可能多的口供。

在狱中，七十多高龄的他，还同样不允许使用真实姓名。1970年10月23日，悲惨地死于监狱。临死时，他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还悲怆地连连呼唤自己的名字：“胡锡奎……胡锡奎……胡锡奎……”结果还是以无名尸焚烧，最终尸骨无存，不知魂散何处。一个曾被国民党三次判处死刑而没死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地死在了自己人的监狱里。

就在胡锡奎死去的两个月前，1970年的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公开批判陈伯达。明明是揭发陈伯达的一个功臣，唉……胡老，你冤不冤？（其实，陈伯达和毛泽东本来有可能是亲家的。1960年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在西便门卧轨自杀，江青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本书就不说了。我是想到了极左势力的这几个人，怎么可能搞得好呢，插上这一句。）

但是，平反还得等到文革结束后。1979年1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胡锡奎等五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大会由李先念主持，胡耀邦致悼词。一面鲜红的党旗，覆盖在胡锡奎的骨灰盒上。然而，他的骨灰盒里，放着的却只是他的一个印章。■

部分参考资料：

《胡锡奎》，梁柏青，《孝感市文史资料第三集》，1986年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薄一波、刘澜涛、程子华、聂真：《深切怀念党的忠诚战士胡锡奎同志》《人民日报》，1980年4月3日。

【文 摘】

“时汉人事件”始末

金宏达

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展览中，有关“文革”别的未多提，重点提到“时汉人事件”，“时汉人”是一篇文章上用的作者署名，何以竟成为一个事件呢，这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才有的。

一

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武汉一所大学读中文系的研究生，那时，按规定有一段游学的时间，费用可以公出，我们便到北京去，会一会名人。“文革”刚刚过去，名人受够了压抑，有来访者一般也不拒绝，何况我要去见的这位作家，也是刚刚走红起来，听了电话里的自我介绍，很爽快地约定了时间。

当时这位作家的住房自然也还是很狭仄，我赶到的时候，房间里已经坐着三个客人了，想来是上一拨逾时未走的，主人就向他们介绍我，说我就是“文革”初期写为吴晗辩护文章的那个“时汉人”。

话音才落，只见这几位客人忽地都站了起来，动作中透出一点点吃惊。

“原来你就是时汉人！”其中一位说。

“我们前两天还在议论说，时汉人又出来了。”另一位语气中也掩不住有点兴奋。

那个特殊时期，一大批被“四人帮”打倒的老干部和各界名人正陆续获得“解放”和恢复名誉，“谁谁”又“出来”了，是人们经常议论的时事话题。他们所指“又出来了”，是我又接连在《光明日报》上用“时汉人”的笔名发了几篇文学评论。通常，“又出来了”

的，都是一些当年的大人物，我想，或者他们在微微的吃惊中，未尝没有一点那样的意思：这个“又出来了”的“时汉人”，竟然是面前这样一个小角色。

确实，正当毛泽东发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布局捣毁“三家村”，彭真力图以“学术批判”对抗之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时汉人”的文章，公然从政治上为吴晗辩护，一时影响很大，这篇文章是我写的，而我当时只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

二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一发表，就已经引起全国震动，其势汹汹，令人感到有一种不测之威。

当时我们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四年级，刚从河北衡水农村搞完“四清”运动回来没多久，原想可以转入正规课程学习了，却又停下课来，搞“学术批判”。

我们哪里能知道多少背景，即如这个“学术批判”，后来也被指为“假批判”，是要保吴晗过关、掩护“主帅”遁走的烟幕。总之，一切皆是按上级布置行事，大家就讨论“清官”好不好啊，“退田”对不对啊，基调都是批判吴晗的：既然他歌颂“清官”，阶级立场肯定就错了。那时对吴晗还称同志——吴晗同志为什么会犯错误呢？那是因为世界观没改造好，民主革命过来了，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了，教训是深刻的云云。

记得有一段时间，天天都在宿舍开小组会讨论，这种讨论是冗长而乏味的，报上不断有许多此类的讨论或批判文章出来，凡属正面意见都看得出来——无论是言谈中的口气，还是版面上的位置，《海瑞罢官》属于“毒草”，必得批判无疑，虽然是青年学生，大家也都有些“世故”，即使有想不通的，也不说，发言同仇敌忾，口径相当一致。

其实，我也无意于唱什么反调，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记不清是因为谁的什么话引动自己的反感了，我争辩说，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但也不能绝对化，不能说有什么效果，就一定有什么动机，比如说，有人无意间失火烧了房子，并不能就此说他是有意纵火。医

生没能挽救病人生命，但不说他主观上就是要杀人。吴晗写历史剧《海瑞罢官》，社会效果不好，但不能说他动机一定不好，如果说他的写作动机是反党，他不就是反革命分子了吗？显然不能如此做结论。

当我说“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这话时，我是知道毛泽东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确实是如此这般说的，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些中文系学生，《讲话》早已念得滚瓜烂熟了。所以，话一说出口，心里也有点不踏实。我的争论对手们当然更是口含天宪，他们坚决反击我的这种错误言论，也不记得他们是怎样不顾逻辑上障碍的了，总而言之，越是争论，越使我不服，争论也分不出高低。

校一级的“上面”很快知道了这个争论。他们秉承当时北京市委指示，执行“放”的方针，应该说彭真他们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用意，奈何许多有不同意见的人，有过“反右”斗争的惨痛教训，硬是将自己当作聪明的“蛇”，决不出洞。据说校方召开过座谈会，敦请各位知名教授敞开思想畅谈对姚文元文章的看法，不承想与会者已有前车之鉴，异口同声都说该文章实在“好得很”，“坚决拥护”，会议主持者几乎近于绝望。现在忽然跳出这个在动机与效果问题上钻牛角尖的年轻学生，全然是意外的收获。

我被通知去参加党委宣传部开的一个座谈会，会议参加者不多，气氛相当轻松，也看不出有专为我安排这会议的意思。主持者特别强调，是大家随意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另还特别点出，是不是讲自己真实意见，也是对党组织的态度问题。那个时候，一提对党组织的态度，就像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顶。已经到大学四年级了，我们班级只有几个人没有被“发展”入团，我即是其中之一。我的主要问题是走“白专”道路，而且有过一些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言论，例如，在1962年刚刚入学不久，一次政治课讨论会上，竟然“鹦鹉学舌”式地说“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此外还有其它种种，后来整我的材料，这些都记录在案。来参加这个座谈会之前，已有政治辅导员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敞开思想，忠诚老实，接受组织考验，争取尽快加入共青团。既然说不说实话是这么重要的立场和态度问题，那我就照直说吧。

我便在会上又照实重复自己的那些意见，只是更系统一点，更严密一点，也或者，更“诡辩”一点。何况，“开弓没有回头箭”，自己的意见只能靠自己来维护，在频频陈述和交锋中，话语更不断衍生。

三

1966年元月的京城，寒风呼号，天凝地闭。

北京师范大学的北饭厅里，一场全校的《海瑞罢官》讨论会在举行，或许是已到临放假时的缘故，来开会的人并未满场。但因为会上有各系选送的不同意见者发言，唇枪舌剑，也还吸引了不少人。

我是发言者中的一个。我的发言观点已经很明确，学术批判不能简单化、绝对化，不能据效果而定动机，要定吴晗的动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须看他的其它表现，看他的全部社会实践，而从当时掌握的情况看，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简单化、绝对化的，不能同意他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宣判。

实在说，我的意见并不具有多少学术性，只是在谈到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不可绝对化时，我引述了文艺理论课上学的“客观意义大于主观动机”的命题，似乎有一点学理上的根据。然而，“文以气为主”，年轻而气盛，气盛则话也听得过去，这大约也就是后来关锋、林杰在他们长篇文章中点名批判“时汉人”时说的“其声甚高，其言甚辩”罢，当时也赢得了在场一些人的掌声。

散了会，便有一位做辅导员的女教师跟过来，说你今天的发言不错，领导要看看，能不能整理一个稿子拿去？我手头确有一个发言的文字稿，若要整理，怕是来不及了，当天晚上，就要登车南下回在武汉的家。她说那就留下这个稿子吧，要用也就是在内部刊物上用。听说要在内部刊物上用，我觉得拿出去的这个发言稿实在不成熟，又叮嘱一句，如果用，就和我联系一下。女教师说，那没有问题，这样，你要不想用真名，也可以留个笔名。

用什么笔名好呢？过几天我就是武汉的人了，那么就叫“时汉人”吧。后来，据说康生作批示曰：“时汉人就是吴晗的人。”如此谐音解读，也似有那么一点意思，而当时，我哪能想得那样周至而重大，呜呼！

在武汉度寒假的时光，有一天，天色有些放晴，路上经过一个报栏，凑上去看看，却撞见了“时汉人”三个字，再一看，竟然在《人民日报》上——我的那篇发言稿登出来了，用的标题是：《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在版面的下方，占了小半版，标题下有编者很精心拟的“内容提要”：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这种由编者加署“提要”，也是当时媒体一种很高妙的手法，它既能似乎很贴近原文的观点，又能让人一读即知其属“反面”而颇近荒谬，显出编者的态度和立场。虽然离开京城未多久，形势却是在发展，报纸上、广播里，斗争的火药味愈来愈浓，如果说我的意见早些时候放在校园里说说，不合时宜，只限一定范围，也就罢了，现在拿到“第一大报”上来，不就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靶子吗，于是，立即有一种不祥之感。

四

果然，“时汉人”文章一出，就有了强烈反响。

在当时正进行的关于《海瑞罢官》讨论中，不是没有所谓的“反面意见”，也不是没有为吴晗辩护的文章，既然是讨论，就一定有交锋的双方，讨论的组织者在刻意设计、安

排对立面时，尤其煞费心思，随意打开当时的报刊看一看吧，各种质疑姚文元文章也不断“破门而出”，然而，像署名“时汉人”的文章如此公然理直气壮地从政治上为吴晗辩护的似乎还是仅见，何况还发表在堂堂的“第一大报”上，占了近半版的篇幅！

《人民日报》既然“放”了这株“大毒草”出笼，它就不能不随即表明自己正面的立场和态度，所以，没过几天，一篇署名“薛舒”的《不能用折衷主义混淆是非》的文章，便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

“薛舒”者，谐音“学术”也，据说即是当时该报主持“学术”版面的编辑们的集体笔名。将“时汉人文章”与折衷主义联系起来也是于此首见。现在人们之间有了争执，只要想把问题解决，都力图寻求一个“折衷”方案，以达致“双赢”的结果。而在当年的“阶级斗争”中，人们被告以不能搞“折衷”，搞“折衷”便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便是不革命或反革命。吴晗被控写《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矛头指向伟大领袖，这可是天大的罪名，一个人被逼无奈或不得不违心地承认一些较轻的罪名，可谁会违背事实地去承认自投死地的罪名呢？当此之时，你只能跟着一起吆喝，逼当事者承认，断不能以第三者身份出来说几句公道话，说了就是你错。

这篇文章写道：

像时汉人同志这样挥舞折衷主义破烂武器的人，是不是真的“折中”不偏不倚呢？是不是真能站在所谓“第三者”的立场说话呢？时汉人同志虽然说了许多貌似公正的话，但是，除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以外，整篇文章几乎都在责难批评者，而对于吴晗同志的错误却曲为回护。例如：对于批评吴晗同志的许多文章，时汉人同志说，“理由充足的部分，我们也同意，理由不足的地方，我也有异议”实际上，大家对吴晗同志的批评，他一句也没有同意，反而给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轻率”、“武断”呀，什么“简单化”、“绝

对化”呀，什么“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呀，什么“压服”、“拿不出充足的证据来”呀，总而言之，一无是处。

不难看出，时汉人同志并不是什么第三者，而是完完全全站在吴晗同志一边，为吴晗同志的错误打掩护。

此文虽是第一篇，但给“时汉人文章”一下就定位了。为什么如此之准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康生当时作了批示：此文“假科学、假公正、假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吴晗的立场上为吴晗辩护，时汉人就是吴晗的人。”“薛舒”的批判文章所发挥的就是这批示的意思。

后来，从大字报揭发批判材料中获知的还不止这个批示，据说“时汉人文章”发出来后，彭真也很重视，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北京日报》社长范瑾，指示立即转载。又有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宋硕要来学校调阅作者档案，意图不明。

最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份内部简报称：“时汉人的文章出来后，京沪两地的老右派齐声叫好。”其根据何在，不得而知，但的确有人讲过，从这篇文章的文风和口气看，很像是吴晗的一位老朋友，忍不住站出来说话了。

五

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吴晗做什么“自我批评”也已经不能满足批判者的胃口，他们的火力所向，从吴晗又扩至“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而指向他们所谓“舍车保帅”的那个“帅”。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学校的处境尴尬而艰难，本来终于发现并培植了一个大大的“反面意见”标本，是立功的事情，而今却变得像是欠了帐。学校里的一切正常的教学都收摊了，除了天天开会批判吴晗、“三家村”和《燕山夜话》之类外，也有的课程还就地取材，以“时汉人文章”为“反面教材”，上起了一、二百人

的大课，例如“公共政治课”就系统地讲授革命导师对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批判，“文艺理论课”自然也特别重温“讲话”，要把被“时汉人”歪曲的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再纠正过来。

报刊上反击“时汉人文章”当然不以“薛舒”的文章为止，仅在《人民日报》上就有不下六、七篇，同学们都开始有意避开我，他们结集成小组在撰写批判文章。有一次，我去中文系所在楼层的一个房间找人，出来了一位女生，她用身子挡住门，示我以“禁入”的意思，多少年后重逢，她对我说当时他们是正在讨论批判我的文章。

那是一个极其难忘的“风雷滚滚”的春天，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主要是接二连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那些一篇篇“重头文章”，文章或点名或不点名，挟枪带剑，咄咄逼人，经由广播员特有的语气、调门播出，真有一股“风雷”般的气势，将人们笼罩在一派震惊、肃杀的氛围中。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三月的一天，中央台早晨的新闻联播竟然全文播送的是林杰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批判“时汉人”文章的长文，文章的题目是《学术批判必须突出政治》。这个时候，林杰的名字对于我们已经不再陌生，他虽然还比不上姚文元、戚本禹，但已经与关锋共同署名发表批判文章，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威权地位。这篇文章是对“时汉人”文章全面、系统也是最严厉的讨伐和批判，它声称在当时的学术批判中存在一股以折衷主义反对突出政治的思潮，而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时汉人”。在层层剖析“时汉人”文章的论点论据之后，反复质问“时汉人”究竟反对什么，且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回答：“时汉人”反对的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六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

六月二日，政教系学生谭厚兰贴出了炮轰北师大校党委的大字报。

在经历了很短暂的“革”与“保”的交锋之后，许多人都陆续加入了炮轰校党委的阵营，大字报贴满了宿舍楼和饭厅的墙壁。校党委的负责人被指为与“黑帮”有联系，其主要罪状即忠实地执行了当时北京市委的旨意，把这一场斗争别有用心地引入“纯学术讨论”，而“流毒全国”的“时汉人”大毒草的出土，便是他们犯下的头条“罪行”。“时汉人”文章正式升级为一个严重事件，因为即使是北大、清华，似乎也没有出现配合北京市委领导人部署的如此显著“业绩”。许多大字报称“时汉人”是“吴晗的积极辩护士”、“折衷主义和诡辩论大师”、“右派学生”，更多的径直称“时汉人”为“臭名昭著的大毒草”。相关的揭发材料说，市委主要负责人曾经询问作者的情况，有意于将“时汉人”提前毕业调入市委，以充实写作班底，因此，“时汉人”又被称为“彭真的大红人”。

所幸斗争的高潮如骤风暴雨，人们忙于揪斗“黑帮分子”、“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不管是“因私”还是“因公（？）”，“泄愤”成为更切迫的需要，对“时汉人”这样的“右派学生”的处置还来不及考虑，我侥幸逃过了一场随时降临头上的“生死劫”，倘若在外地，绝对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在“文革”往后的进程中，我被打入“另册”，同学们和我拉开距离，我不能参加什么“红卫兵”组织，如果写大字报表述对学校形势的某种看法，也不能署上我的真名，以免持对立意见的一方揪住你的“尾巴”，大喊你是别有用心的“坏人”。我原应该一直就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游离其外，不幸的是，在一年多之后，还是按捺不住表露反对师大“女皇”谭厚兰的倾向。

我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校园里，早已有人宣告“拥护或反对谭厚兰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仅仅反对她即已是“反革命”，何况你还身负更应严惩的“罪行”！一九六八年的三月间，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这些人一向被认为是谭厚兰的“后台”——倒台之后，京城的局势忽然发生了一个戏剧性变化，原本传言中要倒台的人没有倒，谭厚兰居然在剧烈的“地震”中又站稳了脚跟，遂毫不迟疑地以铁血手段展开“反攻”，在

校内到处抓捕和暴打反对派。不出所料，高音喇叭中传出了“把反革命小爬虫时汉人揪出来示众”的口号，一场“触及皮肉”的“革命行动”迫在眉睫，我只得仓皇出逃。

然而，这一次我是“在劫难逃”，我的全部生活供给都被切断了——没有粮票，没有伙食费，短暂的避难不得不结束，我又怏怏然回到学校接受“最后的审判”。放下行装半小时之后，我便被戴上事先早已准备好的牌子，上书打了大红叉的“反革命小爬虫时汉人”——这是当时一种已通行的称呼，用以表示对位置甚低的一类反革命分子的蔑视和憎恶。自居为革命派的同学将我押到宿舍楼前一块空地上，大声宣布我的“罪状”，并高呼“打倒反革命小爬虫时汉人”以及“誓死保卫红色政权”、“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一类口号，随后就开始游街示众。当时的况味自是终生难忘，双臂被两位同学反拧着，另有一人时时按下要抬起的头颅，牌子上穿过细细的铁丝，在脖子上竟越勒越紧，以致令我顿时有窒息之感。

七

结局当然是我并未能轻易“就义”，尔后还有接二连三的批斗，高潮是在初夏的一天。那时候已接到指示，滞留在学校的四年级学生，要和三年级学生一起分配，“方案”正在讨论中，班上“文革”领导小组决定对我再发力斗争一次，算作临行前的重要政治交待。

我必须承认，当时他们所掌握的材料，对我来说是非常要命的。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那篇路人皆知的文章。事实是我在头一年的仲夏，和一位平日要好的同学接待了他的女友的一位女友，一次饭后散步闲谈中，我讲到师大斗争彭德怀时自己的见闻，受一种有充分信任感的氛围激发，我未加掩饰对“彭大将军”的赞美和钦敬。对于听者而言，一些言辞显然印象过于强烈，那位远来的女友回去追记在她的日记本上，另外还有一些对“中央文革”要员的“不敬之词”，以及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论。真是难以想象情节会如此推演：不久后，她因为家庭问题被抄家，日记本落入了“革命派”手中，无意中倒抓获了我的“罪证”——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把我打成罪不容诛的“反革命”。

材料迅速转到了北师大，它们确凿不移地证实了写“时汉人”文章的这个人骨子里就是反动透顶，必须批倒批臭。我自知承认是死罪，唯一出路只有矢口否认，在批斗会上不肯低头，为此，头颅首先大吃其亏，身上其他部位也尝了不少拳脚。末了，批斗者叫我“滚蛋”，离去时，我依然做“茅坑里的石头”状，大约又冒出一句“詈语”，于是又有几位勇士追将过来，最终是将我按在干涸的水沟里，行一顿暴打。

同班同学终于要走了，一位平日过从尚多的同学，悄悄向我出示了“班文革领导小组”整理的厚厚一沓材料，给我的定性是“右派学生”。不久之后，被遣送去营房在河北怀来县的部队劳动，在军人的管理下，我们从事种水稻和采小铁矿的劳动，度过了两年时间。一起来接受再教育的人成分相当杂，有的是当时响当当的左派学生，有的是一般革命群众，也有一部分是右派学生和犯有各种错误的，后者又分可以拿基本工资的和只拿生活费的。生活费是人民币20元，仅够吃饭，这种人问题性质严重，前景绝对不妙。我是属于拿生活费的。

一年多以后，学校来了人“落实政策”。主持校政的早已换成了“工、军宣队”（全称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谭厚兰自己也先是被送到我所在的这个部队的另一个团来“锻炼”，尔后则又被押回去“审查”和“交待问题”，我们个人命运的转机即隐含在这种时势的变动之中。学校来人给我看一份“结论”，大意谓我由于世界观未改造好，于运动初，写了一篇错误文章云云。

由“时汉人”文章而引起的事态暂告一段落。尽管我被告知与我本人“见面”的上述结论不会记入档案，事实上当然不是。在后来若干年的生涯中，直接或间接接触过档案材料的人都知道我的“严重问题”。一直等到“四人帮”垮台，吴晗的冤案平反，这个档案袋方得到彻底清理，不过，大的社会历史已经“拨乱反正”，这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文 摘】

文革记忆

——一个北京大学普通教师的动乱经历

颜品忠（北大哲学系教师）

第一章 毛泽东吹响“文革”的进军号

1966年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宋一秀、夏剑彖、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

聂元梓（女）是我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宋一秀等六人也都是我哲学系的党员教师和干部。

当时，我正在门头沟区清水公社田寺大队的“四清”工作队办公室，红色电波响彻云霄，我想：北大燕园此时此刻一定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色之中了。

第二天傍晚，消息传来：6月1日当夜，中央已派出工作组进入北大，并通知凡参加农村（包括门头沟、通县、昌平、顺义等）“四清”的北大师生一律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北大参加门头沟区各人民公社“四清”工作的师生约200余人。我所在的田寺大队，位于北京市西南角百花山之麓，地点偏僻，交通不便。与我在同一工作队的，除王队长是门头沟区机关干部一人外，全都是北大人，有哲学系心理专业女教师任仁眉、地质地理系留苏回国的教师承继成、北大印刷厂干部老唐，还有地质地理系3名男女大学生。我们一走，这个工作队只剩队长一人了，还搞什么“四清”？！

6月4日，在门头沟区搞“四清”的北大师生全部回到学校。一进校门，北大往昔的平静、宽松、严肃而愉快的学府氛围已经荡然无存，一眼望去，处处是大字报与看大字报

的人。

我到哲学系报了到，被分在一个教师学习小组里，十多个人在哲学楼二层一个房间内学习、讨论，上午、下午都如此，后改为半天学习讨论，半天时间到校园内看看大字报。在学习组内，气氛严肃，还较自由。当时我们都是非党教师，无事一身轻。

一、毛泽东批发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

在学习组里，要阅读、学习的文件报刊资料不少，但最重要的资料莫过于聂元梓等人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因为它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从其战略火力所向上看，还只仅限于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及北大党委正副书记，而从其战术步骤上看，大字报一开头就点出“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然后，便采取“句句逼问，逐步推进”的手段，从而断定陆平、彭珮云等所执行的“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并将陆、彭等与“邓拓一伙黑帮”挂钩，以引导读者对宋、陆、彭等“到底是些什么人”的问题自己就可作出“定性”的肯定结论。

大字报通篇看不到任何论理的表述，字字句句充满着的是浓浓的火药味。

此外，大字报尚有几处存在交待不清的缺陷。如第4、5、6段，一开始便是引文，没头没脑，到底是谁说的话？是宋硕、陆平们说的，还是聂元梓们自己说的？因你聂元梓们是党员，他陆平们也是党员，让马列主义水平不够的读者朗读起来真够费劲！

比如第四段第2句引文说：“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紧接着下面又有一句显然是大字报作者说的话：“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可是这二句话中，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七个完全相同的、一模一样的汉字，作者在该段即第4段开头引文前没写“谁说”，即主语不明，那你聂元梓们这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叫读者吟咏起来怎么不费劲呢！

其实，第4段中4句引文是宋硕说的。第5段中有宋硕说的一句，陆、彭说的两句。第6段中有宋硕的两句，陆、彭说的一句，宋硕说的又一句。如果嫌费事，怕啰嗦，每段开头只须加上“你们说：”就清楚了。这样，大字报作者便可把你们意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的话，与你们自己要予以驳斥、抨击的话严格划清了界限。

像这样一篇未成“今文观止”的大字报之作，竟使聂元梓一夜之间陡然成了威震四海、名传全球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领军型大明星，这无论在当年，还是在今日，实在仍都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大问题。

当年在我们学习组里，大家读罢这张大字报，谁都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彼此都回避讨论。

二、聂元梓大字报之炮制出笼并非历史偶然

聂元梓因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而名满天下，有人说她是“政治投机”。这种说法，不管是出于蔑视还是出于妒忌，均属流于一般之论，而且说得也过于轻便了，实际上这是低估了聂元梓的政治野心及其奋搏能量。只要观察她1960年调入北大前后的历练，就可得出她是个“非寻常之辈”的论断。

（一）调入北大 小觐学府

聂元梓早年投身革命，一路拼来也不容易。建国后，全国干部第一次评级，聂元梓才29岁，竟被评定为“12级”，成了“年轻的老干部”。

50年代，她丈夫是哈尔滨市副市长，聂任市委理论处长。因丈夫有男女作风问题，聂常借上北京中宣部开会之机，一走就是半年甚至一年，以避家庭矛盾。也正因为此，聂说在哈尔滨市委的“职务提拔什么的，就没有我的份了。因为我在北京的时间多，（哈尔滨）市委的工作自然就没有办法抓，难以作出成绩”（《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页70）。由此可见聂元梓心中有关“提拔”问题的得失考量。

聂元梓的大哥聂真是中国人民大学负责管理干部的副校长。当时人民大学经常有调干

生，即从各单位选派一些年轻且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到学校学习，然后重新安排工作。聂元梓 1959 年秋冬之间与其夫离婚，企图调到北京工作。北大校长陆平从聂真处获悉此情况，便不考虑什么调干生的问题，就直截了当地要了聂元梓来北大哲学系或经济系当领导。

就聂元梓来说，北大哲学系是个怎样的系？经济系又是个怎样的系？她根本就没有在心中掂量一下。她说：“原说是要我到哲学系去，后来经济系需要人，我就到经济系工作。我呢，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经济学，在人民大学学习过哲学，对这两个专业都有一些了解。因此，我到哪里工作，就看工作需要”（《聂元梓回忆录》，页 74）。她说得这么轻巧，似乎北大这两个系也像她在中央党校和人民大学学习时那样的调干速成班，以她这般的学历和水平就可以驾驭胜任了。可以认为，她是小看了北大的哲学系、经济系了。从根本上说，她把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太不当一回事了！

聂元梓到底文化水平如何，谁也说不准，但只要看看她在“文革”时讲话中的笑话，也可作为对她评价的参考。在她当北大校文革主任时，她常在大饭厅向全校师生员工讲话。每次讲话后，北大“三角地”便贴出不少“老佛爷笑话”的大字报，我迄今还记起二则：一则是她把“披荆斩棘（jī）”念成“披荆斩辣(là)”；二则是她把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说成是“赫鲁晓夫”。这虽然是后来“文革”中发生的笑话，但可说明当年陆平校长把她调来北大，也怨他自己是看走了眼了。

1960 年 6 月，聂元梓调来北大任经济系副系主任，而正系主任是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陈老此前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大商学系主任）。如此搭配的正副系主任，能是最佳“黄金搭档”吗？

（二）社教显形 卖陆求荣

1963 年初春，聂元梓又被调到哲学系，担任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说：“我和陆平的关系一向是很好的，是他把我调到北大的，而且一直受到重视和提拔，从系里的副主任提拔为系总支书记和学校党委委员。”“到了哲学系，又被选举为北京市党代会的代表。”“党代会代表比人代会代表更重要。”“我的住房，陆平也给我安排得

很好，是新建的（8号公寓）三居室。”“我对当下的各方面都很满意，日子比在哈尔滨好得多。”“这一段时间是我建国以后工作最顺手、心情最舒畅的时光。我对北大的工作环境很满意，对陆平也很感谢。当时，没有陆平的信任，不可能在哲学系做总支书记。”

聂元梓对陆平为何把她派到哲学系来当总支书记，也有她一段精彩的领会：“哲学系是全校的一个重点，也是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的一个重点。再一点，哲学系的工作系统比较复杂，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可以直接指导，中宣部、教育部也可以直接下指示，交任务。这种情况常会不经过学校一级，一下子就插到哲学系里来。哲学系有一些人也是‘通天’人物，他们和中宣部、教育部的领导都有交往。这样，有时陆平知道，有时陆平也不是能及时知道，上面的指示就下到系里了。所以，很多的头绪，都落到系里。情况如此复杂，陆平要想掌握住哲学系，当然要派他手下的得力干部才行”（《聂元梓回忆录》，页78）。

聂元梓既然知道陆平把她作为自己手下得力干部而加以如此重用，那么，她对陆平则又是如何“知恩图报”的呢？

1964年7月2日，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组长的中宣部调查组10人进入北大进行调查研究，聂元梓以其“左”的“慧眼”视角向调查组描述了陆平个人的“严重”问题及“北大资产阶级气味比较严重，不讲阶级斗争……”（《聂元梓回忆录》，页83）等问题。

同年8月底，张磐石写了一份《报告》，说：“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北大党委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份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委对这些问题却没有认真抓。”《报告》声称北大党员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报告》说：“哲学系聂元梓同志向我们反映，北大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提拔和重用一大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页726）。聂元梓本人也承认张磐石称赞了她，她说，在《报告》中“还引用了我的谈话，作为重要论据”（《聂元梓回忆录》，

页83)。

张磐石写的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宣部对北大工作的重视，决定就在北大搞“社教运动”的试点，并拟定了一份《计划》，说“从11月起在北大开展社教运动，弄清北大在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搞清学校各级组织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是资产阶级手里，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等五项任务”（《北京大学纪事》，页729）。

于是，从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文教部门及全国高校抽调干部近二百人，组成一支强大的社教工作队，在队长张磐石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北大。

工作队进入学校后，哲学系是重点，首当其冲，张磐石亲自抓，运动先从哲学系入手。在一次大会上，张磐石说：“北大有几个总支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人事处、组织部的问题就更乱了。”又说：“哲学系正在进行的大论战，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北大阶级斗争的缩影。”他还再一次表扬了聂元梓（《北京大学纪事》，页730）。

哲学系由于十多年间越来越“左”的政治思想路线所致，在党员教师和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因素，两派意见分歧很大。“张磐石把陆平找来参加会议，要他来听取群众意见。陆平一听就受不了了，头上直冒汗，手直哆嗦”（《聂元梓回忆录》，页85）。

读者阅到此处，谁都不免会产生一个大惑不解的问题：聂元梓调来北大已有4年，与陆平的个人关系很好，她知道陆平信任她，重用她，把她看作手下一名得力干部，也可说视为“心腹亲信”，但聂元梓为什么不把自己对北大、对陆平本人的看法和意见事先找陆平本人直言进谏？再说，聂元梓又是北大党委委员，从党的组织原则上说，也可在党委会上先把问题摆一摆，然后再找陆平个别谈谈。可是她没有这样行事，却把自己一肚子话尽情倒给了调查组长张磐石，为张磐石写《一号报告》提供“重要论据”。后至社教运动时，才叫陆平来听会，使陆平很被动，受不了，“头上直冒汗，手直哆嗦”，非常狼狈不堪。聂元梓这么做，到底是出于对陆平的某种“积怨”而恩将仇报，还是旨在“卖陆求荣”而不顾良知？

对此令人不解的疑惑，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原已作好了三条解释的准备：

1、聂元梓说：我对全校的工作“看出了一些问题，想对陆平说说，但又觉得不好讲，而且他也很忙，没有机会”（页79）。又说：“我对学校党委的工作有了一些看法，本来想找陆平谈一谈，但我找不到适当机会”（页79）。又说：“有时我想找陆平说一说，总是看到他很忙，一直没有适当机会”（页81）。又说：“我对陆平的意见，应该对他本人讲，可是，我没有合适的机会”（页82）。综上所述，聂元梓的理由是：本想找陆平谈谈，但无适当机会。

2、聂元梓说：“现在是中宣部副部长带工作组来……他们当然比我的水平高、能力强，如果把我对陆平的意见讲了，他们找陆平谈一谈，也许他就能听进去改进工作了”（页82-83）。

聂元梓在此处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党的好女儿”，似乎她的意见通过工作组找陆平谈，比她本人先找陆平谈更能使陆平听进去，更有效地使陆平改进工作！

同时，她把陆平这位北大一校之长也当作“天真幼稚”、“头脑单纯”的白痴，似乎陆平会觉得聂元梓“背陆投张”才是他的心腹亲信，聂元梓把北大“资产阶级气味浓厚，不讲阶级斗争”，“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诉之于张磐石，才是他陆平的得力干部！

更且，她尤把国人也视为“天真可蒙”的愚民呆子或弱智小儿，似乎认为她这么做才是“一颗红心向着党”！

3、聂元梓说：“显而易见，我只要继续跟着他（陆平）走，向他靠得紧一点儿，自然有很多优势……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受到重用，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当然很高兴”（页79）。又说：“只要紧跟陆平，肯定继续受提拔受重用，而且，他对聂真已经表示过这个意思”（页82）。

聂元梓这第三条解释，不料她自己却一语道破“天机”：原来她是把“想跟谁、紧靠谁——讲意见、谈看法——受提拔、受重用”联在一起考虑的。据此，她之所以宁可背弃陆平而选择紧跟张磐石，其原因所在，便迎刃而解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既

说自己“只要紧跟陆平，肯定继续受提拔受重用”，那么她改道易主而紧跟张磐石，难道就马上会变得纯洁到丝毫没有与可能受提拔受重用联在一起的企盼吗？！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说：“当时这么一讲，张磐石就觉得我讲得很好……在他们工作组的会议上称赞我”（页83）。聂元梓由此开始受到称赞、赏识。后又因一张大字报而名驰四海，荣誉、声望、官衔、权力接踵而至，“红卫兵造反派领袖”、“北大校文革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直至“中共九大中央候补委员”等等。这是后话，但可作为她“卖陆求荣”、“步步高升”的佐证。

综上三条解释，前二条是她自圆其说，不足为由；第三条二句话，文意表述不完整，不合逻辑，但却泄露了她自己的“天机”。

（三）不甘失败 揭竿发难

1965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对北大做出了基本估计：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同志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3月21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对陆平说：毛主席说了，你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张磐石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错误指导思想和错误斗争方法受到了批判。他的北大工作队队长职务被撤销，改由许立群担任。

在国际饭店召开的北大党员干部会议期间，那些紧跟张磐石走的所谓北大社教运动积极分子，被要求提高认识，与张磐石的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而以聂元梓为代表的社教积极分子则认为：“实际上，这个会议就是要整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整我们这些给校党委、给陆平工作提意见的人”（《聂元梓回忆录》，页87）。

聂元梓不甘失败，抖擞精神，寻找“通天”渠道，让田家英转呈毛主席、刘主席一封告御状的信。信上说：“北大进行社教运动是中央的决定，群众提意见是经过工作队动员的……都不应该受到追究，不应该挨整……抓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不放干什么？”（同上，页88-89）

告了御状没有回音，聂元梓有点气馁，但反陆平之心未死。恰在此时，有两件事为她提供了再反陆平的客观条件：一是66年《五·一六通知》的发布。

《通知》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彭真，聂元梓说：“那他对北大的态度，他所支持的陆平，肯定也是错误的了。《通知》批判彭真‘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包庇了邓拓、吴晗，在此之前的社教运动中就是包庇陆平，打击给陆平提意见的同志。……至于北大和陆平，在传达中央的这一重要文件（颜注：指《五·一六通知》）以后，并没有联系北大工作中的问题再做出什么具体而深入的行动，去批判彭真、批判‘三家村’，这又可以成为他们紧密追随彭真等人的确凿证明。”（《聂元梓回忆录》，页114）聂元梓接着说：“彭真的垮台使我看到了希望：北大的问题有希望得到澄清，在社教运动中给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所受到的批判和冤屈也有希望得到解决。”（同上，页115）聂元梓说：中央文件要求“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开火，这又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同上，页113-114）

《五·一六通知》对聂元梓来说，犹如给她注射了一枚强心针，极大地激发了她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政治欲望和野心！

二是康生妻子曹轶欧等人来北大的调查。66年5月间，康生派他的妻子曹轶欧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组长的名义，带领张恩慈等人来北大“调查”，并对曹面授机宜说：“从北大点火，往上搞。”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教师，50年代他和我曾同在一个教研室，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他是本教研室的团支部书记，我是团员。他给我的印象是：读书很用功，工作很抓紧。教研室里有他一张办公桌，他几乎天天在编写自己的讲稿。凡说人论事，他的分析和看法总较“尖锐”、“深刻”，往往令人感到他似乎马列主义哲学学过了头。他的眼神，目光炯炯，但又目无余子，使人觉得此人不好相处。55年他曾任肃反小组长，57年又曾任反右小组长，组织任命与他无关，但他借此也积累了一定的如何整人的经验。社教运动中，在所谓“给北大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情况下，他怎么竟与聂元梓站在了“一条战壕”里而成了社教运动积极分子。他离开哲学系后，怎么又跟康生、曹轶欧走到了一处，当时我乍闻这消息，颇感惊讶，后再一想，又觉得不足为怪。

聂元梓与康生、曹轶欧早年就认识，这次曹来北大调查，张恩慈正好充当曹聂之间来回传话的跑腿小伙计。正是通过他的传话，聂几次与曹见面，并领会曹的授意，起草反北大校党委和陆平等人的大字报，经两易其稿后，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便这样炮制出笼了。

不料，5月25日在大饭厅东墙贴出后，引起了全校的激烈争论和思想混乱。“大多数师生员工认为这是一张用诬蔑不实之辞攻击、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聂元梓等人明知他们集中攻击的“宋硕讲话”是华北局的指示，却硬说这是宋硕、陆平、彭珮云的阴谋诡计。”（《北京大学纪事》，页755）

“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后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稿直接送给当时在外地的毛主席。康生要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让她‘顶住’。”（同上，页775）

聂元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毛泽东正是康生为她借来的“东风”，把她这张大字报吹得满天飞，吹得她红得发紫，不可一世。

综上所述，聂元梓并不是一般所谓的政治投机分子，更不是那种看中时机赌它一把的政治赌徒。她本是一个怀抱政治野心，自觉沿着“左”的政治思想路线步步紧跟的所谓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可叹的是：数年中她风头出尽，却不知“物极必反”这一古训将必在她身上得到应验！

第二章 刘少奇派来短命的工作组

毛泽东主席在杭州批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当夜，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研究决定，由华北局负责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约200人进驻北大。

工作组也把北大问题说得很严重，宣布：“北京大学党委抗拒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北京大学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北京大学纪事》，

页 756)

6月4日,陈伯达来校看大字报,并向学生讲话说:“北大是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堡垒,他们是在培养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当接班人,是一个很顽固的堡垒。”(同上,页756-757)

6月6日上午,我正在大饭厅附近看大字报,忽然发现一群学生拥着康生走过来。我也便随在学生们身旁听康生说话。康生边走边说:“我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底稿送给主席看,主席就批了,交给电台广播了。电台一广播,聂元梓就解放了,我也就解放了,哈哈……。”显得非常得意。这时我突然觉得很反感——一个中央领导人,一个被誉为“无产阶级理论家”的老革命,怎么会表现出如此的轻佻?!康生还接着说:“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这很好。不管他彭真也好,陆定一也好,陆平也好,一切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分子都不可怕,我们要和他们斗争到底。”我想康生现在是个胜利者,显出十足的趾高气扬!

北大现在是工作组的天下,但工作组毕竟初来乍到,混乱局面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稳定。况且陈伯达、康生相继来北大煽风点火,给本来就把“非理性的”狂热错当“革命性的”热情的青年学生更是火上加油,致使以陆平为首的校系两级“黑帮”被揪,被批,被斗,被辱,被打,被骂,都落到了非常狼狈不堪的境地。

哲学系被定为“黑帮”的,有王庆淑(女,前系总支书记)、任宁芬(女,前系总支副书记)、冯瑞芳(女)、许政援(女)、孟昭兰(女)、徐明(女)、徐大笏(女)、辛文荣(女)、罗曼(女)、谢龙、高宝钧、杨辛、汤一介、施德福、赵光武、陈志尚、张凤波、王义近等共18人。而当时也有称“十七个半黑帮”的说法,因其中罗曼原是系办公室主任,许多工作没有她办理不行,所以她不能像大家一样被圈在一处学习文件、检查问题,办公室有事就出去,办完了就回来,进进出出,故而算“半个黑帮”。

这18个人在65年国际饭店会议上,都是聂元梓的对立面,都是拥护校党委和陆平、维护原系总支和前书记王庆淑的党员教师和干部。他们之被定性为“黑帮”,无疑是聂元梓们手中的“朱笔”所勾画。所谓“黑帮”,即泛指反动集团或其成员是也。“朱笔”一勾,便成“黑帮”,难道此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谓也?!

当年，哲学系地点在南阁，“黑帮”们都被圈在南阁一层楼朝南的大阅览室里学习文件、检查问题。有一天，我们在哲学楼的教师学习组听说王庆淑、任宁芬几个“女将”被学生揪出南阁批斗，我们即一起跑到南阁路边观看。只见王庆淑等都站在南阁北大门外台阶上，每人身上都被用浆糊贴着一张写有“黑帮”二字的大字报纸，低着脑袋被一群学生在批斗，辱骂声、口号声连接不断，使人实在看不下去。把意见分歧的对立面打成“黑帮”，又将其进一步描绘成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此也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60年代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所新创的一种当代人物形象恶魔化的文化吧。

聂元梓原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此时是革命左派掌权。所以除哲学系外，原北大党委及各系党总支全部陷于瘫痪，从而，校系两级党的领导权全部由工作组取而代之。于是，最初的混乱局面才得以稳定。不料，时至6月中旬，一个谁都意想不到的“六·一八”事件，竟给工作组的命运带来了“灭顶之灾”！

一、“六·一八”事件与工作组的命运

66年6月18日上午，一些学生趁工作组干部开会之机，冲破初建的“革命秩序”，在西南校门区学生宿舍38楼等处设了所谓的“斗鬼台”，分头抓来一些系或单位的党政干部、教师来“批斗、游街、罚跪、挂黑牌、戴高帽、用墨汁涂面、拳打脚踢，甚至发生严重侮辱女干部女教师的流氓行为，直到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等赶到制止，才逐渐结束。……今日共有69人被抓到‘斗鬼台’等处批斗。工作组并抓出四个打人最凶和侮辱女同志的人，其中一人是校外混进来的”（《北京大学纪事》，页758）。

翌日，工作组向中央和市委呈送了有关“六·一八”事件的《简报》。中央又将此《简报》批转全国，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6月21日，工作组又向中央和市委写了关于北大20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其中讲了“六·一八”事件的经过说：“我们抓住这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

命的事件……”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曹轶欧批示：“报告写得很好，在策略运用上，狠下了一番功夫，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曹轶欧6月21日”（《北京大学纪事》，页759）。这是曹轶欧表的态。

6月27日下午，陈伯达来北大看大字报，说：“‘六·一八’事件不简单，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反革命司令部，要把这个地下司令部挖出来”（同上）。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表的态。康生则提出，要揪出这个“事件”的后台。这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表的态。

不意时至7月中旬，突然上边来风转了向，说：把“六·一八”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些大员们无一不随风改口。

聂元梓也从康生处了解到上边对工作组态度的突变，于是紧跟表态，在7月19日哲学系群众大会上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一直自感颇受工作组冷遇而蛰伏哲学系办公室的聂元梓，此时马上活跃起来，眼看又要东山再起。

二、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丢人现眼

7月22日、23日，江青、陈伯达等人连着两天来到北大，撇开工作组，举行座谈会，召见聂元梓等人，煽动他们起来反工作组、赶工作组。

江青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故作姿态，口吐谦逊之辞说：“同志们，我们是来作小学生的，跟同志们一块儿来进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说着说着就露出了狐狸尾巴，忘了“谦逊”，提高了音阶，说：“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儿。”

江青在北大连开两天座谈会后，估计反工作组的先锋力量已经基本形成，决定一鼓作气，乘势亮牌。7月25、26日两个晚上，在北大未名湖以东的东校门旁的东操场，召开关于“工作组”问题大辩论的万人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北大师生员工及其家属，以及外校闻风而来的人。我们都自带方凳，以各系、各部门为单位，从台前自西向东排列成行，在操场上坐下。

台上坐的几乎都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大员：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等人。此外，还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吴德等人。

这个大会，名之为“辩论会”，但谁都心里明白：江青主持大会，空中悬挂着尚方宝剑，反工作组的人似乎个个训练有素，逐个上台振振有词，把工作组因“六·一八”事件而引起的问题定性为“执行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试问，在此种气势下，有谁还敢于上台进行这种所谓民主原则下的自由“辩论”，为工作组说几句实事求是的公道话？！

当时，在全国瞩目的北大万人大会上，即使在形式上能展开“辩论”，其实也已是无甚意义的了，因工作组的命运已定，它只不过仅在等待判决罢了。所以，时迄40年后的今日，如果想弄清工作组当年在处理“六·一八”事件问题上的是非曲直，我认为：既无必要，也无多大意义。

但北大这两晚的万人大会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历史记忆的，却是江青的表演。

我记得是25日的大会，江青怎么把德高望重的朱老总也请了来，安排他坐在主席台的右边一角里。江青在主持大会中间，突然走向朱老总，要请朱老总说几句话。我们坐在操场上的人从扩音器里听到朱老总说自己没有什么话要讲，再三婉言谢绝，但江青坚持请他走到台前讲话。我们从扩音器里听到朱老总的讲话不太利落，话音也不甚清楚。这时我顿然明白了朱老总年已八旬，行动、说话已不如当年。江青这样做并非尊重朱老总，而是歪心要出朱老总的丑，似乎示意大家：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员现如今已是老态龙钟，颤颤颤了。江青如此卑劣的用意，引起我内心的极大愤懑。

在第二个晚上万人大会上，江青主持大会，把对待工作组态度问题的定调提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高度！她越讲越激动，越激动越想自由发挥。她突然联系到女儿李纳在北大历史系的事，说李纳在农村搞“四清”时，因病想请假回家，教师郝斌不批准，这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吗！接着她又把与毛岸青妻子张少华（邵华，时为北大中文系学生）的矛盾抖搂出来，越说越忘乎所以，越说越无法自控。我觉得江青这时是不是已

进入角色了，入了戏了，似乎把讲台错当舞台了。听她声嘶力竭的喊说：“张少华的后台是她母亲张文秋，张文秋实际上是个政治大扒手，她把阶级斗争搞到毛主席家里来了……”江青不顾身份，歇斯底里，又哭又闹，真是丢人现眼，既令台下万人瞠目结舌，惊讶不已，同时也不得不叫人产生了对她的无比反感。

大会散场后，我和妻子姜鹑鹑一到家，我便忍不住对她说：“幸亏我们俩没有去张文秋家，否则我们今晚就得跑！”姜鹑鹑说：“当时我在台下就想到了。”

至于张文秋想邀请我俩去她家玩一事，原因如下：她的小女儿张少林原是西语系学生，由于身体欠佳，时常请病假。我妻子姜鹑鹑时为西语系管理教学行政工作的教务员，对少林很关怀，不仅准其病假，有时少林回校后功课落下来，她还请有关教师给少林补补课。张文秋作为家长，可能出于感动，有一天特来北大西语系要见见姜鹑鹑。在闲谈中，张文秋说起当年她和丈夫，以及毛泽民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关押，后毛泽民和她丈夫等人被杀害的历史。后来她和其他许多同志经党组织的多方努力，才被营救出狱，等等。张文秋对姜老师表示谢意，并提出邀请姜和我俩去她家玩玩。姜不善与人交往，一再婉言谢其邀请。

从此，直至1976年江青“四人帮”被打倒后，张少林来到北大中关村我家看望姜老师。当时，我们问她：“那晚江青在台上点了你姐姐的名，真让人揪心，后来你们跑到哪儿去了？”少林说：“那晚我和姐姐逃离北大，躲到董老家里了！”

关于江青那晚在北大的丢人现眼，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也有一番描写，颇值得摘录一二。

在其《回忆录》中，第九章第二节的标题是“江青在北大的拙劣表演。”

聂元梓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对江青是尊重的，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后来产生了怀疑。这怀疑首先还不是政治上的，是人品上的。”

“为什么会对江青产生怀疑呢？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几次来北大，看大字报，召开座谈会，并且于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连续两天晚上

召开全校万人‘辩论’大会……江青也在大会上讲话，她的讲话让我有些反感。”

“这么严肃的大会，全北大上万人参加，江青又是那样的身份，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文化革命运动怎么搞，朝哪里发展，你倒是讲出些水平来啊！没有想到，她在会上婆婆妈妈，讲了很多她的家务事，讲她的儿媳妇张少华（韶华）怎么怎么不好，还讲到她的亲家、张少华的母亲怎么怎么不好——这样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讲这些家庭琐事干什么！我本来对江青的印象就不够好。当年在前方，听说毛主席在延安和一个电影演员结婚，大家心里就嘀嘀咕咕的，党组织专门发了通知，不许议论这事件，这才把大家的嘴给堵上了。在延安，我又听说江青对警卫员，对照顾她的‘小鬼’都那么不好，颐指气使，随意斥责，对她就更没有好感了。在北大听她胡扯乱七八糟的家务事，我就想，有多少重要的事情你不讲，关于运动怎么发展，你也不讲，你到北大是干什么来了？！这样，首先是从情绪上，我对江青就有点看法。”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的这番表述，我相信她讲的是实话，对江青是真的反感。因为，那晚在北大万人大会上，不论是反工作组的一派，还是为工作组辩护的一派，我敢说，北大两派对江青的拙劣表演，都会不由从心底产生同样的反感！但我难以想象，当时坐在台上像康生、陈伯达这一溜儿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会不会因江青之如此丢人现眼而感到自己在这个地球上也丢尽了脸面？！

江青说罢她的家庭矛盾，陈伯达即把话题扳回到工作组问题上，说：“北大工作组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障碍物！”他鼓动北大师生要“搬掉这个障碍物！”

至8月4日晚上，江青又来到北大主持万人大会。台上仍坐着一溜儿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被几个学生押上台前低头站着。康生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说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说“张承先把‘六·一八’革命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完全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康生带有煽动性的讲话，致使“张承先当场被几个冲上台的中学生用皮带抽打，并被批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北京大学纪事》，页763）。

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终于夭折！

可是，北大的工作组问题，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却占有份量非常之重的一章。1966年，刘少奇于6月1日当夜即派出工作组进驻北大。8月5日毛泽东主席突然拿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写道：“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大字报上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应指66年6月1日起经北大“六·一八”事件至7月20日后的天数。日期说的准确，从7月22、23日起江青就以钦差大臣身份频频在北大出现，连续数个晚上主持北大万人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

我于前面已经认为：当时形势已明，工作组已是“死老虎”一只，有何可辩论的？不仅在当年，即使在40多年后的今天，都无意义可言。可是“工作组问题”在整个十年文革中，又占有不可忽略、抹煞的首要地位，其要害问题，就是“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才50多天，毛泽东就掐死了它”，这是为什么？这也就是研究“工作组问题”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摘自北大哲学系教师颜品忠《“文革”记忆——一个北京大学普通教师的动乱经历》

（出处：颜吾芑的博客）

【资料】

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载《人民日报》1966年2月10日第5版

时汉人

提要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文字很长，内容很杂，概括言之，它的基本精神是自我辩护，包含有反批评的成分，同时也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尽管这些在文章中不占主要地位，也没有作深入的批判，但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是客观事实。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不完全同意别人对他的批评，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他的文章题为“自我批评”，实则以很大的力量作自我辩解、洗白和澄清，名不副实，文不对题，无怪乎有些同志很气愤了。

最近，各报发表了不少对《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中理由充足的部分，我们是同意的；理由不足的地方，我也有异议。这里谈几点意见和大家讨论。

动机和效果问题被弄得简单化了

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写歌颂海瑞的文章、剧本，其真实的、具体的动机何在？他内心是如何想的？有些同志很急于要知道这一点。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虽然引述毛主席的话承认自己立场是有问题的，看来这个回答不能满足有些同志的要求。他们指责吴晗同志假装糊涂，自欺欺人，一定要他招认出“不可告人的目的”，交代当时是如何自觉地配

合阶级敌人复辟活动的。究竟根据什么呢？无它，先从作品思想内容分析，联系彼时阶级斗争形势，引出作品客观效果，然后据效果而定动机是这个或那个，是谓动机和效果统一论。

是的，我们是主张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我们对于动机和效果二者的关系的看法，既不要强调动机否认效果，也不要强调效果否认动机；既要同唯心论者划清界限，又要同机械唯物论者划清界限。我们应该用《海瑞罢官》在演出、发表的当时产生的社会效果，去检验吴晗同志的主观意图是否正确，或者说，他的心是否好。

通过对剧本内容的分析，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宣扬了超阶级的国家观，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表现了吴晗同志错误的道德观、历史观等等，对退田、除霸、平冤狱和海瑞的“傲骨”的描写，在当时起了某种程度的配合阶级敌人进攻的作用。这就可以断定吴晗同志的主观动机是不好的，是有立场问题的。

事实上，吴晗同志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往下再追问他的主观意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就需要从吴晗同志的全部社会实践中拿出许多事实，进行周详的、严密的、具体的考察。不能说，有什么效果就是作者有这个或那个动机，《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是配合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吴晗的动机就一定是号召人们“退田”、“平冤狱”，搞反革命复辟活动。这样说，看起来倒也干净利落，方便省事，动机和效果绝对地统一起来了，但这样搞“统一”是形而上学的统一，是机械唯物论者轻率的作法。把问题弄得如此简单化、绝对化，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知道，在文学上有所谓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思想的问题。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生活真实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他创造的艺术形象的客观意义往往大于或超过他的主观意图。马克思说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等“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686页）。这不是说狄更斯等如何比当

时的资产阶级学者高明多少倍，对那些政治和社会真理都认识到了，而是说他们的作品在再现现实生活时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获得了较大的客观意义，可以说是非作家意料之所及的。

同样，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有他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但他决没有表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揭露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的主观意图，因为他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是，一个今天的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读者能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红楼梦》的思想意义里有一条是表现了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性的。很显然，我们不能说有这个效果，曹雪芹就一定有这个动机。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有很复杂的因素的，它是作家力图表达的思想、用以表达思想的方式、作品发表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以及读者自己的体验等等多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同作家本人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把动机和效果完全等同起来。

那么这样说，对吴晗同志的真正创作动机是否就不可知了呢？不，一方面固然要有待于吴晗同志自己去检查，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摆出吴晗同志全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材料进行分析，参照其作品的客观效果加以判断。不能单凭作品的客观效果下结论，那是既说服不了吴晗同志，也无法使读者心悦诚服的。总之，对这样关系重大而特别需要慎重的问题，批评者是不宜太武断的。

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了

学术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学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学术必然要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学术领域内的斗争必然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是分析学术问题的阶级实质的理论根据。这个道理吴晗同志是有些懂的，他没有认为《海瑞罢官》只是学术问题，而承认它在政治上客观效果是恶劣的，是一个政治性问题。

问题在于，具体到每一个人，学术问题上错误是否都可以归结为政治立场的反动的表现？吴晗同志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一个人可以有截然对立的政治上的和学术思想的两种阶级立场，这种概念是不科学的，也是人们不能理解的。但从全文看，吴晗同志所表达的意思多少可以触及，即是他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但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思想深处还蕴藏着不少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因而在特定条件下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应该说，这是可以说得通的。虽然任何学术问题的错误最终都可以从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找到解释，但学术问题还是有它的特殊性的。一个人学术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可能是其反动的政治立场的表现，也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熟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还有怀疑所致，而且与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水平，与由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泛滥于整个学术研究领域的某种思潮都有关系。

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说：“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又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具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政治立场同时由于不熟悉或怀疑马克思主义而在学术问题上犯错误的人是存在的。

有人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在学术上便会作出与他的政治立场相适应的表现。”这个说法一般说是正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学术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但不能把问题绝对化，以为一个人的学术上的错误一定是其政治立场反动的表

现。按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在现实生活中势必要把一些不是政治立场反动的人打到敌人那一边去，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

有的同志虽然也同意不能把问题绝对化，同意生活中确有一些人犯这样或那样的学术上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但是断言吴晗同志是一个例外，说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以学术作为保护色，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足以使这种说法成立的真实凭据究竟有多少呢？光是吴晗同志前几年学术问题的一些言论和活动就能够使人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吗？政治斗争是十分严肃的事，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否反动，需要从他的全部社会实践的具体材料出发，特别是要考察他对党的领导、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的革命工作的基本态度如何，不能轻率地根据某一方面情况下结论。实际上，这种简单化的作法已经造成某种僵持局面，即一方面某些同志一口咬定吴晗同志对自己过去几年中所作所为的反动性很自觉，其政治立场是完全反动的，另一方面吴晗同志也不能被说服，坚持认为自己是不自觉的，政治立场是站稳了的，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一下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同意姚文元同志的这一分析：“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论断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并不排除一个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的人在某种社会条件下不自觉地当了阶级敌人的义务兵的可能性，也不排除一个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阶级敌人乘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可能性；既不排除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的必然性，也不排除在这个或那个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作家笔下反映出来的偶然性。它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通过对吴晗同志过去几年中宣传的错误的学术思想批判，应该促使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是如何反映的，揭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阶级实质，因而从中汲取深刻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思想阵地。我们认为，这才是我们头等重要的战斗任务，至

于吴晗同志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似乎不必急于替他作结论。

对吴晗的批评拿不出充足证据

我们认为，对于吴晗同志发表文章，承认某些错误，提出看法，应该抱欢迎的态度。吴晗同志如果继续坚持他过去的意见，只要讲出理由，就应该深入研究，如果他提出了新的看法，也应该认真予以考虑。应该说，吴晗同志发表文章对讨论的深入开展是有好处的。

现在有些同志动辄就说他的“自我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进攻、新挑战，又拿不出很充足的证据来，这是无助于讨论的。我们认为，这个讨论还只是刚刚揭开序幕，离作结论还太早，谁是谁非大致上有个眉目了，但是涉及许多具体问题，如清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等等，还远没有完全弄清楚，也没有在学术界取得一致的看法。吴晗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里提出的不少看法是值得我们讨论的。

有人说，他又宣扬了中、小地主和农民利益一致论，宣扬了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和被统治阶级当前利益一致论，宣扬了海瑞的“退田”给部分农民带来了好处，一言以蔽之曰：宣扬了阶级调和论。问题果真能作这样的概括吗？不能。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评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干脆把它抛弃了”，他说：“宣布这个哲学是错误的，还不等于制服了这一哲学。”这里，我们无意于作什么比拟，只是希望我们的批评者能重视对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解释，真正作到以理服人，不能压服。

另外，对吴晗同志的文章的批评也要实事求是，错误的意见应该批评，正确的看法也要肯定。引用吴晗同志的原文，必须力求准确。有的同志在这方面注意得还不是很够的，断章取义，削足适履，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不顾作者的原意，随心所欲地加以肢解、硬凑，乍看起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经不起对证和推敲，这样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引证

史料，尤其要有科学态度。已经有人指出某些同志引证同一资料里合乎自己论点的部分，抹杀掉不合自己论点的部分，这种手法也是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齿的。

我们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内围绕《海瑞罢官》问题展开的这一场大辩论，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思想界的反映，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这一场斗争主要是以学术辩论的形式进行的，因此它要求我们既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在这方面，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我们的表率。

马克思在他的名著《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说：“每一种以科学批判为根据的判断，都是我欢迎的。”他对论敌的意见，总是认真考虑，然后以充足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和极大的战斗力给予回击。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这种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这场大辩论中不仅反击喧嚣一时的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而且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解决多年来没有正确解决的许多问题，从而发展、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提高学术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造成一个同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的高涨形势相称的学术文化大繁荣、大兴盛、大提高的新局面。为此，当前对于吴晗同志的批评中的某种简单化倾向，不能不加以克服和防止。■

【资料】

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

哲学系 郭罗基

经过严重的斗争，在新北大，右派势力垮了，反动逆流被打退了。当前迫切要做的事，就是整顿左派队伍，带动广大群众，向着文化大革命的新的峰前进。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发表的同时，推荐了《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介绍了东方红小将们开门整风的倡议，这两者绝非偶然

的巧合，而是有它内在的联系的。党的政策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去贯彻，要正确的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就必须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去掉自己头脑中的不恰当的东西，就必须整风。北京的许多单位已闻风而动。相形之下，新北大对于整风显然很不热心。是没有什么可整吗？当然不是。忙得来不及整吗？未必正确。不抓整风，匆匆忙忙搞三结合，匆匆忙忙批刘邓，匆匆忙忙斗黑帮，等等，都是搞不好的。思想不提高，做什么都只是原地踏步。

左派队伍要整风，领导骨干尤其要整风。

这时我想到了你——聂元梓同志，作为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为什么对于整风这件事很不敏感呢？这是否和你一贯的对待思想改造，对待自我批评的态度有关呢？

我们是共过患难的战友，在国际饭店会议的反革命事件中，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疯狂反扑中，我们哲学系的许多同志都挺身而出为你辩护，也就是为北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辩护，为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辩护。虽然我们对你的缺点和错误比谁都了解得清楚，在敌人和别有用心的人要把你置于死地的时候，我们不愿谈论你的缺点和错误，只是希望你到了正常的气氛下自觉地作一些清理。但是，你自己，长期以来，头脑是不清醒的。反对你的人抓住你的缺点和错误，加以歪曲夸大，往往使人觉得不信，最了解你的缺点和错误的人，又常常作为你的政治上的辩护人出现；你自己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又比较差，这样，就使得对于你累积起来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没有作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你一定还记得，我和李清昆等同志几次三番向你建议：把校文革的工作好好总结一下，并趁总结工作的机会，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认真地作自我批评。你也表示同意。就是迟迟不见行动。有一次，你还要我为你写“检讨”，这就不能不怀疑你检讨的诚意了。即便是别人代劳的“检讨”，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作。

你也不会忘记，陈葆华等同志向你提过多少中肯的意见，我们从爱护你出发，常常悄

悄地向你提意见，这样做，有一定的效果，但对你震动不大。看来，对你来说，很需要在广大群众监督之下，把你自己也当作革命的对象，系统地清理一下思想。

你是否知道，哲学系的同志有这样的心情。一方面，我们的革命大方向是一致的，大家愿意和你一起干。另一方面，又常常为你担心。不为别的，就因为你这个人自我批评的精神差，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差，名声却很大，出了问题，就非同小可。你的这种毛病，使多少亲近你的人感到不安！

形势不利的时候，在某种压力下，你会做言不由衷的“检讨”。形势一变，翻了身，对于一些明显的错误，你又根本不检讨，这两种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国际饭店会议的后期，在陆平黑帮软硬兼施的压力下，你做了过头的检讨。陆平黑帮被打倒了，你又似乎觉得自己一切都正确了，把六四年社教中说错了的话也说成是对的。路远、周闯《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贴出后，你慌慌忙忙地召开会议，作出决议，承认它是“革命的大字报”。后来，形势起了变化，你又趾高气扬起来。十一月一日，在东操场大会上你作了一个讲话，“红联军”、“井冈山”大吵大闹，你（还有杨学棋）就叫广播台的工作人员把你的讲话录音中的某些片段从磁带上抹掉。以后借出的那个录音磁带就是经过加工复制的赝品。你们做的极端秘密，就连哲学系的许多同志也一直瞒着。聂元梓同志，如果你认为有几句话讲错了，就应该公开地作自我批评，郑重地更正。不应该采取这种不正当的手段。这是你文过饰非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如果你当时的讲话本身没有错误，而在“红联军”、“井冈山”的压力下，做出这种小动作，那么这种做法也是个严重的错误，在这里，我们要警告“井冈山”“红联军”，如果想捞半根稻草，利用聂元梓的错误进行翻案，那是妄想！办不到！

你所以缺乏谦虚谨慎的态度，恐怕还是私心杂念太多之故。我觉得你考虑个人荣誉太多，考虑自己的缺点错误太少。例如去年九月文革选举后你就病了。你找了几个人在病床前面授机宜，要他们写几个发言稿。一个是国庆宴会上用的，一个是天安门庆祝大会上用的，一个是校内群众大会上用的，还说：“各种场合的发言多写几个，放在口袋里……”

这就是你上任校文革主任以后所应考虑的主要问题吗？你对校内外的形势、筹委会时期工作上的问题，很少考虑。所以一出院，路远、周闯的大字报一贴，打了一场无准备的遭遇战。

你在同陆平黑帮的斗争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立下了功劳的。你的缺点和错误是在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前提下发生的，而且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你的毛病不少。但是，你的状况，同你所肩负的工作责任，还是不相称的。你的许多缺点、错误，现在不整，更待何时？在未来的革命征途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同你站在一起，共同战斗，为你所坚持的革命原则作辩护。一个襟怀坦白、忠诚积极的共产党员，也不需要任何人来为自己的错误作辩护。

聂元梓同志，勇敢地站到整风中来领导整风吧！新北大要大整风，大提高！■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 活页大字报选 1967年3月4日）

【读者来信】

1. 邵新英：为邹行的封面设计点赞

让毛泽东长起了马克思的胡子，请马克思穿上毛的风衣，把保尔柯察金的帽这是一个很富有想像力的创意。它说明什么，不言而喻。记得前几期记忆的封面，种种设计，同一匠心。如何让 Fine Art（摄影、绘画、建筑）获得现实感，这是一条路。艺术家们不必去游行示威，不必去行为艺术，把自己的事干好就足够了。你可以把你的感情和思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人们看了这样的设计，就会想，为什么？这难道不是启蒙？向邹行先生致敬！■

2. 林晓：介绍一幅旧画

贵刊的封面设计，有创意，有新裁。十分难得。想起一幅旧画《百花齐放》，不揣冒昧，把我翻译的这幅画的说明录如下——



此作品为 Kiefer 1993 年访问中国时的系列作品“文化革命与毛泽东”中的一幅。作品采用大尺寸的中国领袖拼装雕像与另一幅巨大的抽象拼贴相片放在一起同时曝光，突出雕像英雄状的手势和弯曲的墙砖，与作者的早期摄影与绘画主题“Siel, Heil（嗨，希特勒）”以及纳粹形象极为相似。Kiefer 以同样批判的眼光逼视毛时代的红色遗产，让观者重新体验刚刚过去不久的德国法西斯时代的剧痛。1957 年毛说，“要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无论如何，这里的“花儿们”在沙

土和灰尘的包裹里接受了远远超出画面的全部墙砖，在领袖脚下，在他华丽的重压下，挣扎着开放了。■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行